

李鸿章

中外名人传记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李 鸿 章

黄 波 编著

目 录

一、一心走仕途的青少年时代.....	(1)
1. 耕读家世	(1)
2. 少年科举	(3)
二、“投笔从戎”——镇压农民起义	(7)
1. 帮办安徽团练	(7)
2. 投靠曾国藩、编练淮军	(13)
3. 出任江苏巡抚、赴沪大战太平军	(22)
4. 督师山东、血腥镇压捻军起义	(26)
三、“自强”、“自富”——投身洋务运动.....	(30)
1. 兴办近代军事工业以“自强”	(30)
2. 兴办近代民用工业以“自富”	(37)
3. 兴学育才	(51)
4. 筹办海防与组建北洋海军	(57)
5. 北洋海军的覆灭与洋务运动的破产	(67)
6. 洋务运动评析	(76)
四、“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李鸿章的外交活动	(80)
1. 早期“和戎”外交	(81)
2. 后期“以夷制夷”外交	(88)

3. 李鸿章外交活动评析 (96)

五、“山穷水尽疑无路”

- 晚年政治生涯 (98)

1. 环游欧美五国 (98)

2. 同情、支持康梁变法 (102)

3. 镇压“义和团”、支持“东南互保” (105)

4. 签订《辛丑条约》与在民族屈辱中升天 (106)

一、一心走仕途的青少年时代

1. 耕读家世

李鸿章，本名章铜，字渐甫，号少荃。1823年2月15日（清道光三年）生于安徽合肥东乡大兴集一个世代“耕读之家”。

李鸿章先世本姓许，自江右湖口迁至合肥。合肥位于长江、淮河之间，在美丽富饶的巢湖北岸，属于巢湖盆地，土地广沃，塘水停注，旱涝保收，“民物殷富，俗尚勤俭而崇节义”。李鸿章八世祖许迎溪与同庄李心庄既是姻亲又是好友，心庄无子，请求收养迎溪次子慎所为嗣，迎溪欣然应允，慎所的子孙便改袭了李姓。因而李门祖规为：“许李二姓不准通婚，而与族外之李姓通婚则不禁止。”跟中国一般传统的中上农民家庭差不多，李氏世代以“耕读”为业。李鸿章的高祖父李士俊，由于“处家恭俭”，从最初“清贫无田”发展到后来拥有200余亩土地。但因李家有钱无势，缺少政治靠山，所以时常受到人家欺凌。李鸿章的曾祖父李椿，字凤益，处事“不畏强御，申辩得直”，从而逐渐改变了李家受人欺凌的状

况。李鸿章的祖父李殿华，在两次参加省里组织的举人考试不中后，退居乡间课率子孙耕读，足迹不出家乡几乎达 50 年之久。李殿华虽然凭借祖先余荫，继承了一部分土地财产，但因李氏宗族繁衍众多，家大业却不算大，所以他能够分得的财产为数不多。所以在现存文献中，往往有殿华役使佃户、雇工和家境贫困的似相牴牾的记载。其子追忆说：“凡田亩近坟墓，春耕（其父）必督佃户雇工坟旁多留隙地，无主者亦培土于其冢，使无倾塌。”殿华可能是个小地主，在封建社会中，这种小地主家庭是典型的所谓“耕读之家”。李殿华生有四子，依次为文煜、文瑜、文球、文安。家庭人口众多，经济负担沉重，但李殿华坚持“耕读”之家的根本，一刻也不放松对子弟的督教课读。李鸿章父亲李文安，字式和，号玉泉，生于 1802 年。李文安启蒙后，与其兄一同由父亲亲自督课，每当作文写成之后，父亲必先加以详细审阅，指出其中需改进地方。由于李文安少时多病，天资“中下”，所以其父让他随长兄李文煜读书。在长兄的严格督教之下，其专心攻读，初步奠定了做学问的根基。自 1822 年起，李文安一面继续刻苦攻读，一面设馆授徒。从 1825 年开始，数次参加江南乡试，多次名落孙山后，终于在 1834 年考中举人，4 年后又成了戊戌科进士，朝考入选，分发刑部任职，后官至督捕司郎中，记名御史。在封建社会，“权”能转化为“钱”，政治上得势，同经济上致富是密不可分的。从此，一向以“力田习武”为业的合肥李氏宗族，由于李文安“以科甲奋起”，一跃而成了庐州一带的望族。李鸿章母亲李氏，是合肥李洪漠的女儿，“秉性淑慎，教子义方”，堪称封建士人的贤妻良母。她生有 6 男

2 女，经济负担比较沉重，但她克服种种困难，勤劳节俭，“尺布寸缕，拮据经营”。有人担心她家人口众多，生活艰难，而她却坦然以对，声称：“吾教诸子发愤读书，皆巍巍有立，岂忧贫哉！”她克服经济上的种种困难，让诸子“发愤读书”，她唯一目的就是想方设法为几个儿子创造条件，让他们朝着“学而优则仕”的道路拼搏。李文安有 6 个儿子 2 个女儿，李鸿章在兄弟间排行第二：长兄翰章，三弟鹤章，四弟蕴章，五弟凤章，六弟昭庆。

总之，李鸿章就出生于这样一个典型的耕读之家，家庭经济状况、政治地位、文化素质等诸多因素，都在其身上留下了深深印记，使他在对生活道路的选择上也深深打上了家庭的烙印。首先，这个家庭属于官僚地主阶级，但经济状况拮据，促使李鸿章知道生活艰辛，刻苦自励，锐意奋发向上；这个家庭政治权势不大，具有较为强烈的提高家庭政治、经济地位的愿望，促使李鸿章具有强烈的参政意识。其次，这个家庭推崇儒家伦理道德和“学而优则仕”思想，希望子孙“策远志”“出风尘”，成为清朝统治阶级的忠诚卫士。这种特定的家庭环境和条件，推动着青少年时代的李鸿章按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条传统的封建士大夫人人生模式迈出一步又一步，并对他终生处世为人、服官治事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也决定了他的基本人生志趣和归宿。

2. 少年科第

李鸿章青少年时代，正是中国封建社会进入末世，清王

朝面临深刻的政治经济危机、西方殖民主义者把侵略触角伸进神州大地之时。社会环境的熏陶，家庭出身的影响，封建思想的束缚，使这个时候的李鸿章把自己的前途寄托于科举功名，期望有朝一日通过科举的门径登上仕途，挤进统治阶级的行列。

李鸿章 6 岁开始在家馆中学习，李文安既是他的严父又是他的良师。1834 年，当父亲到费氏墨庄就馆时，12 岁的鸿章也陪同前往攻读。1835 年、1836 年、1838 年这 3 年因其父继续赴京会考，没时间再当教书先生，李鸿章便拜堂伯父李仿仙为师。此外，李鸿章还会受教于徐明经。在包括父亲在内的 3 位先生的严格督导和学问的陶冶之下，李鸿章在初涉义理和经世致用之学尤其是应付科举考试的制艺技巧方面进步很快，18 岁时考入县学成为秀才。此时的李鸿章，才华初露，心气高傲，自信心强。决意克服“因循”积习，珍惜美好的青春年华，再接再厉，刻苦攻读，要作那西汉终军、贾谊式的年青时就扬名于世的人物。1843 年，李鸿章在庐州府学被选为入国子监学习的优贡生。时任京官的父亲望子成龙，函催李鸿章入京，准备参加第二年的举人考试。抵达京城后，李鸿章先住安徽会馆，后又移居狮子胡同马文虎家。在京城，他心志专一，并未被京城繁华富贵的情景所吸引。为了学业的长进，他在不久之后，便以子侄辈的礼节拜见了在翰林院供职的曾国藩。自此，在曾国藩指导之下学习经学和应付科举考试的八股文技巧，成为曾国藩的得意门生和思想、事业上的继承人。1844 年，李鸿章应顺天恩科乡试，“三场文墨，差堪自满”，结果中试第 48 名举人。随后，由曾国藩推荐到

时任翰林的学士何仲高处，一面教授何公子读书，一面准备参加会试。当时北京组织了一个文社，曾国藩担任社长。李鸿章通过这个文社，既与各地人士交游问学，又常常得到曾国藩在诗文方面的精心指教。1845年，他参加恩科会试不中，但其诗文却博得了出任本科会试同考官的曾国藩的刮目相看。在往后两年时间里，李鸿章在发愤攻读经史、以“求义理经世致用之学”的同时，又着意“习制科举之文”。1847年，李鸿章再次参加会试，中2甲第13名进士，朝考后被点了翰林，以翰林院庶吉士供职京师。寒窗苦读十数载，终于跻身科举考试的最高阶梯，并且当上了有利于做学问的京官，这对于李鸿章和他的家人来说，都是一件称心如意的快事。3年期满，李鸿章在1850年庶吉士散馆时，以成绩优异而被改授翰林院编修。1851年起，又累充武英殿纂修、国史馆协修，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中央一级研究机关的高级研究人员。

做翰林、纂修等官，既清闲又能接触到宫廷内的大量珍贵藏书。李鸿章利用职务之便，潜心经史之学，曾写成《通鉴》一书，并以亲身体会谆谆教导他的弟弟和子侄辈。与此同时，李鸿章也很喜好时艺文字。但与他的老师一样反对雕章琢句、内容空泛的文风，而对以委曲婉转、平易流畅著称于世的唐宋八大家和桐城派古文这种文体赞赏不已。他把这两种文体比喻为“出水芙蓉”和“苍松翠柏”。他说：“出水芙蓉，光华夺目，曾几何时，无复当初颜色。苍松翠柏，视似平常，而百年不谢也。”他特别推崇唐代韩愈的《论佛骨表》和北宋苏轼的《代张方平谏用兵书》这两篇文章。他又指出：“《诗》、《书》、《礼》、《易》、《春秋》和《乐经》这6

部儒家经典都是记载传递儒家思想体系的书，后人对之加以遵循阐发，为文虽因时势不同而有文体上变更，但在宣扬封建的伦理纲常、孔孟之道这一点上则是一致的”。总之，文学是为“道”服务的，是“道”的载体，文以载道，这是桐城派古文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桐城派创造人方苞就说过：“作文如果不是阐发儒家思想道德，那么有关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等风尚的文章就不要勉强去作。”此外，由于李鸿章生长在桐城派文论的故乡，且其历任老师如父亲李文安、业师徐明经、伯父李仿仙及座师曾国藩等人，都是桐城派文论的传人，所以他在思想上受其影响也就很自然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出生于耕读世家的李鸿章在青少年时期走的是一条读书做官的道路，也就是说走的是一条中国封建社会一般士子的正统之路：即穷经、守道，用封建的伦理纲常来规范自己，育化自己；用儒家的经典和程朱理学的理论来武装自己，充实自己；用“立功”、“立德”、“立言”的人生追求目标来督促自己，鞭策自己；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抱负来约束自己，激奋自己。这样，就决定了李鸿章对封建传统文化的死力维护，对清朝封建专制制度的血性忠诚。

二、投笔从戎——镇压农民起义

1. 帮办安徽团练

多年寒窗苦读，终于当上令人景仰的翰林院编修的李鸿章，踌躇满志，意气风发，展望未来，前程似锦，原以为仕途之路是一条传统、稳妥之路，无论时代如何变化，社会如何嬗递，朝代如何更迭，走这条路都没有风险。他可以设法接近皇帝，攀附权贵，沿着这条传统升官之路走下去。怎奈“生于末世运偏消”，一场突发的社会震荡使李鸿章不得不儒生充军旅，投笔从戎。

李鸿章在京师供职期间，国内阶级矛盾已经十分尖锐。中国人民在鸦片战争之后，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再加上旧的封建压迫，已经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广东、广西、湖南一带，受到鸦片战争的直接冲击，社会动荡尤为剧烈。1851年1月终于在广西桂平紫荆山麓金田村爆发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军农民大起义。1852年，太平军打出广西，进入湖南。1853年1月，一举攻克武汉三镇。2月，全军顺江东下，水陆并进，以疾风扫落叶之势，席卷东南。3月，攻占东南第一

重镇南京，随即建都于此，改南京为天京，建立了一个与清朝封建政权相对峙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政权。随着太平天国的蓬勃发展，大江南北、黄河上下，边疆各族人民纷纷举起义旗，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清高潮。太平天国的兴起和全国范围的反清狂飚，使得大清王朝处于极度的风雨飘摇之中。于是，竭尽全力镇压农民起义，稳住清王朝反动统治，成为 19 世纪 50 至 60 年代官僚士大夫政治生涯的出发点和终极目标。

当时清王朝最高统治者不断颁发诏书，责令各地“勤王”。无奈八旗和绿营兵因长期养尊处优，不堪一击，“文武以避贼为固然，士卒以逃死为长策”。在这种情况下，咸丰一面用高官厚禄和严刑峻法来制止文官武将和绿营兵的溃逃，驱使他们继续为清王朝卖命。另一方面极力动员各地汉族地主豪绅凭借其在本乡本地的封建政治、经济和宗族势力，“结寨团练”，“搜查土匪”，配合清军镇压太平军，并在南北众多省份任命了一大批在籍官僚为督办团练大臣。李鸿章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奉旨离开京师，回原籍办理团练，从而走上镇压农民起义的道路。

1853 年 3 月，刑部左侍郎吕贤基奉命回安徽原籍任团练大臣，他以李鸿章籍隶安徽，熟悉乡情为由上奏请李鸿章一同回乡，协助办理团练事务。当时阶级搏斗的急风暴雨，不时飘入李鸿章办事衙门的高墙之内，撞入他那沉静安谧的书斋，震撼着他那悠闲自在的心灵。而封建纲常伦理大乱至极的严酷现实，又促使他本能地认识到清政府是地主阶级的惟一政治代表，同他本人和家庭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于是地

主阶级的立场和传统的儒家道德观念驱使作为年轻新进之士的李鸿章遵照清廷意旨，毅然离别翰苑，返回家乡去直接参与镇压农民起义的军旅生涯。不久，他便随同吕贤基星夜就道，奔赴安徽，从此开始了“宛转随人盖九年”的坎坷历程。

当时的安徽是阶级斗争异常尖锐激烈的地区之一：外有建都南京的太平天国的威逼，内有风起云涌、此起彼伏的以捻党为主体的群众反抗斗争。为了保护自身的生命财产，地主士绅们纷纷举办团练，站到反对农民斗争的最前线。其中以凶悍著名的有：桐城马三俊、吴长庆父子；合肥张树声、张树栅兄弟，周盛传、周盛波兄弟等等。团练头子们各处筑圩练团，自称圩主，互不统属，彼此矛盾斗争极为突出，有的练团甚至草菅人命，抢夺民财，焚掠村庄，无异土匪。满怀信心从京城回到庐州的李鸿章，面对这样内外交困的局面，忧郁之情顿生。他虽然血气方刚，年轻得志，有意大显身手，力挽狂澜，大干一番事业，但怎奈自己无权、无兵、无饷，又系儒生从戎，对军事一窍不通，于是他怀着无可奈何的心境，先入署理安徽巡抚周天爵之幕。这时，太平天国忙于巩固南京外围阵地，尚未派兵北伐、西征。而安徽境内的捻军却一跃而起，成为当地抗清的主力。奉命“专司防剿”的周天爵，便把“剿办”皖北捻军、防止其与太平军的联合放在首位。追随周天爵的李鸿章，也自觉地把刀锋指向了皖北捻军。李鸿章随同周天爵主要参与了两次较大的绞杀捻军的战役。一次是兴兵进“剿”定远陆遐龄起义。此次进剿胜利后，李鸿章因功被周天爵奏请清廷赏六品衔。另一次是镇压多达4000余人，活跃于颍州、蒙城、亳州交界地区的陈学曾、纪黑壮起

义。这期间，李鸿章尚未与太平军交战，只在本境依靠地主团练镇压势力不很强大的小股捻军，并且他只起了出谋划策的作用。

1853年5月初，安徽巡抚李嘉端行抵庐州，不久李鸿章就从周天爵处调到李的幕府协办团练。此时，太平军已开始北伐之战。北伐军自5月8日从扬州出发首先进入安徽境内，16日占领滁州，18日攻克临淮关，直逼凤阳。面对北伐军的凌厉攻势，李嘉端胆颤心惊，寝食难安，为了保住乌纱帽，只得作出军事部署：一面奏请朝廷速调江西、湖北等省官兵赶赴庐州救围；一面表示要“号召兵勇亲援凤阳”。本部具体军事行动分为3路：一路派候补直隶州知州李登洲率勇300名为先行；一路派户部主事王正谊于梁园镇会合李鸿章，“号召练勇，借助军饷”，前往凤阳进发；一路由他自己带兵200余名后续前进。然而，就在3路队伍刚刚行动之际，太平军北伐部队于5月28日一举攻占凤阳城，紧接着胡以晃等人率领的太平军西征军又长驱直入安徽境内。6月10日，北伐军和西征军分别占领亳州和安庆，李嘉端等人陷入了两路牵制、腹背受敌的危境。此后一连4个月，西征军采取南攻北守的战略方针，为北伐军解除后顾之忧而深入华北腹地提供了军事、政治条件，李嘉端为了阻止西征军北上夺取庐州，急忙派遣张印塘、李鸿章分别带领团勇驻守集贤关和运漕、东关一带。李鸿章负责驻防的运漕和东关，既是巢湖一带和庐州重要门户，又是漕粮的集散地和运输通道。西征军为了取得粮食以接济安庆和南京，进占运漕，迫使李鸿章带勇退防东关。此次战役，由于西征军意在取得粮饷以接济安庆和南京，未能

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李鸿章也就未遭灭顶之灾，受到了李嘉端奉赏的六品蓝翎顶戴的嘉奖。

就在李嘉端为李鸿章请功后不久，石达开奉命到达安庆，主持西征战事。石达开在皖北改守为攻，派兵进取集贤关、桐城，清兵勇望风而溃，吕贤基成了光杆司令。11月胡以晃督师攻占舒城，吕贤基走投无路，投水身死。李鸿章只得率所部团勇退守合肥冈子集。12月胡以晃挥师直取庐州。新任安徽巡抚江忠源固守庐州待援。江忠源与李鸿章彼此不熟，曾国藩从中撮合，分别致书他们，希望他们彼此配合，相互救援，共挽狂澜。由于江忠源抵达庐州两天后即被围困于孤城，李鸿章本想救江氏于庐州，但力不从心。援助庐州的各路兵马抵达庐州城外，但因将相间不和，庐州终于在1854年1月被太平军占领，江忠源被迫投水自尽，李鸿章也只好率所部团勇北撤。

庐州为太平军占领之后，清廷改派福济继任安徽巡抚，令其会同另一满族将领和春等力挽皖北危局。由于师生关系，李鸿章被召入幕，所部团勇也归福济辖制。庐州地近南京，为敌对双方必争之地。清廷命福济尽快收复此地，以挽回皖省危局。但由于太平军的奋力固守，多次主动出击，致使清军连连受挫，一时无力收复庐州。在这关键时刻，李鸿章以幕僚的身份出谋划策，建议改变攻庐州的作法，采取先攻东南含山、巢县，再进西南舒城的战略，以阻断太平军援军和粮饷之路。与此同时，福济允准李鸿章率兵勇向含山进发，并夺占了含山、巢县两城。1855年8月，李鸿章进逼庐州，因驰援庐州的太平军石达开部为湖北战事所迫，不得不回师援

鄂，李鸿章、福济等部兵勇于 11 月占领庐州。李鸿章由于此次胜利，博得了善用兵打仗的名声。巡抚福济立即奏请朝廷授予李鸿章福建延津邵道道员的官衔，并赏顶戴花翎。

攻复庐州之后，福济又兵分两路，西南直指舒城、三河、庐江等地；东南进犯巢县、和州、东关等地。李鸿章奉命参与东南作战，但屡遭失败。加之封建官场中的互相倾轧、妒嫉，使李鸿章在福济幕府中不得其志，颇受冷遇，但他牢记其父临终前嘱咐，决心忍辱负重，咬牙立志与太平军为敌。

1856 年 4 月至 6 月，太平军分别摧毁了清军江南和江北大营，乘胜对安徽省境内展开强大军事攻势。清军望风而逃，一触即溃。李鸿章年少气盛，依然想主动出击，大举反攻，夺回失去的城池。他率军出战，结果大败而归。是年 9 月，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发生内讧，元气大伤，被迫从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1857 年 2 月，太平军后起之秀陈玉成、李秀成协同作战，在安徽北部发动了防御中的攻势，连克桐城、舒城等地。李鸿章所部团勇被击溃，他只好带家人仓皇北逃。1858 年 7 月，福济被免职，由翁同书继任安徽巡抚督办军务。8 月，陈玉成部攻占庐州，将李鸿章祖宅“焚毁一空”。李鸿章带母亲及几个弟弟逃往江苏境内镇江。至此，李鸿章结束了他的办理团练生涯。

李鸿章回籍督办团练，历时 5 年有余，战场受挫，仕途维艰，“昨梦封侯今已非”。就其客观原因：一是安徽反清形势高涨，捻军和太平军遥相呼应，使清军及团练陷于四面受敌的困境；二是各任安徽巡抚和将帅大员懦弱无能，多为庸庸者流，使李鸿章得不到有力扶持和启迪，“茫无指归”，并

饱尝了封建官场中互相倾轧之苦。从主观方面讲，李鸿章儒生从戎，手中无兵无权，既缺少经验又少军事知识，“好猛进”、“浪战”，只能“号召练勇，劝借军饷”，而此中又困难重重。然而，这5年多的帮办团练生涯，却给他后来独当一面与太平军为敌积累了经验，打下了军政素质基础。

2. 投靠曾国藩、编练淮军

投湘军幕府

1859年1月因团练失败而潦倒失意、怀着悲凉心情自称“书剑飘零旧酒徒”的李鸿章，又受到命运之神的惠顾，他的老师曾国藩着意拉了他一把，使他从一个潦倒失意客一跃而成为湘系首脑的幕宾，从此他的宦海生涯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1853年，曾国藩以在籍侍郎的身份，受命帮办湖南团练事宜，他看出“兵伍不精”是清王朝的大患之一，决心独树一帜，改弦更张，编练一支新式武装，以挽救清朝统治。1854年2月，曾国藩正式编成湘军水陆两军，沿湘江北上抗拒太平军。他采取传统的“以上制下”的战略方针，先清两湖，稳定后方，继而把军锋指向江西和安徽。1858年7月和8月间，曾国藩先后分兵驰赴浙江、福建，进击因“天京内讧”而分裂出走，放弃江西根据地、盘旋于浙闽的太平军主力之一的石达开部。10月，曾国藩亲率所部抵达江西建昌，尚未入福建，石达开部就采取战略转移，由闽入赣，转入湖南。从而

江南军情渐松，而江北却风云突变。面对江南、江北大营进逼天京，湘军围攻安庆、三河，威逼庐州的严峻形势，太平天国后期优秀将领陈玉成、李秀成联合作战，首先摧毁江北大营，解除天京北面威胁，继而在安徽三河全歼李续宾所部湘军精锐 6000 余人，击毙李续宾和曾国藩胞弟曾国华以及文武官员 400 多人。包围安庆的湘军，见势不妙，慌忙逃跑，安庆之围不战而解。在这种危急形势之下，曾国藩决定移师援皖。

此时的曾国藩大营人才甚多，但在这军情紧急，“大局糜烂”之际，他仍千方百计网罗“才志之士”。李鸿章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赶到建昌拜访曾国藩的。1859 年 1 月，李鸿章通过当时正在曾国藩大营负责粮台事务、深得曾国藩器重的哥哥李瀚章的推荐赶到建昌拜见了曾国藩。从此以后，李鸿章留在曾国藩幕府中，“初掌书记，继则负责向朝廷拟订奏稿”。李鸿章素有才气，他没有辜负曾国藩的重托，凡所批阅的公文、起草的书牍和奏折等都深受曾国藩的赏识。曾国藩常常向别人夸李鸿章：“少荃天资聪明，文才出众，办理公牍事务最适合，所拟文稿都远远超过了别人，将来一定大有作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也许要超过我的。”当然，曾国藩虽对李鸿章大为赏识，但对他身上存在的毛病却从不宽待。李鸿章自恃有才，贪睡懒散，日常生活也无规律，因此，曾国藩有意要对他进行训导磨炼一番，以使他变得老成世故起来。曾国藩日常起居颇有规律而富生趣，每天起早查营，每顿饭都必须等幕僚到齐后才开始。他认为这样做既有纪律的约束，又有道德的说教。而李鸿章对于这样严格的生活习惯很不适应，

深以为苦。有一天早上，他假装头疼，没有按时起床。曾国藩接二连三派人催他起床，说一定要等齐人才吃饭，李鸿章见势不妙，披衣“踉跄而往”。他一入座，曾国藩就下令吃饭。吃饭时曾国藩一言不发，饭后却板着脸对李鸿章说：“少荃，你既然到了我幕下，我有话告诉你，我这里所崇尚的仅有一个‘诚’字。”说完，拂袖而去。李鸿章从未领受过当众被严词训斥的滋味，心中受到极大震动。从此逐渐养成了“每日起居饮食均有规律”的习惯，并在曾国藩面前处处小心谨慎，逐渐变得老成起来。

李鸿章到建昌不足十天，曾国藩就决定由他主持增练皖北马队，隶附于湘军，用两淮之特长，补湘军之不足。李鸿章受命，随即遣人至颖、亳一带招募马勇 500 名。但颖、亳地方绅士，借口团练保卫乡里，对往招之人百般阻拦，所以两淮马队之议，没有实行。1859 年 4 月中旬，太平军回师江西，为了援助张运兰，保住景德镇据点，6 月曾国藩急调曾国荃所部湘军 5000 多人，从抚州进兵景德镇，曾国藩即命李鸿章前往协助军务。但李鸿章不愿寄人篱下，想推却，而曾国藩又知他“文武兼资”，于是具折向朝廷奏明，留李鸿章在营襄办军务，自此李鸿章成为湘军正式成员。数日后，曾国藩致书李鸿章，要他担当重任，以图报效君恩，无奈，李鸿章只得前往曾国荃处协助。7 月 13 日，李鸿章随曾国荃攻陷景德镇。14 日，进占浮梁县，胜利回归抚州。11 月，清廷授予李鸿章福建汀漳道遗缺，曾国藩考虑正是用人之际，随即奏留李鸿章继续留任幕僚，担任文案工作，并参赞军务。

1860 年 5 月，太平军第二次摧毁清军江南大营，清朝的

正规军队绿营兵已崩溃。咸丰皇帝环顾左右，只有依靠湘军镇压太平军。于是授曾国藩为两江总督、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所有大江南北水陆各军统归其管辖。这时候，李鸿章随曾国藩驻师祁门，经营皖南。李鸿章鉴于祁门地势偏僻，建议曾国藩留待皖南部署稍定，即应亲往淮扬一带兴办水师。湘军二号统帅胡林翼完全赞同李鸿章主张，曾7次函请曾国藩经营淮扬，并极力推荐李鸿章。8月19日，曾国藩决定采纳胡、李二人意见，奏保李鸿章为两淮盐运使。曾国藩决定兴办淮扬水师，原计划利用淮徐等处风气刚劲，在淮扬兴办船厂，招募两淮之勇，以弥补湘军的不足。为此，他命令李鸿章先到淮扬，初步组建，明年他再亲自前往组建。1861年6月，淮扬水师正式宣告成立。在创办淮扬水师期间，李鸿章曾因李元度失徽州向曾国藩求情，但曾国藩未允许，依然严惩了李元度，李鸿章一怒之下愤然离开曾国藩幕府，回到南昌他哥哥家中闲住了一年之久。后因胡林翼说和，再加上李鸿章恋师生之情，曾国藩大度，亲自致信请李鸿章回营，李鸿章于1861年7月13日从南昌驰赴安庆，重新回到曾国藩幕府，使得曾国藩手中又多了一位得力助手。从此以后，李鸿章忠心师事曾国藩，在老师的言传身教下，在个人修养及政治上都得到了曾国藩的着意栽培和极尽熏陶。

编练淮军

古人云：“时势造英雄。”重返曾国藩幕府的李鸿章虽算不上什么英雄，但是急剧变化的时势却为他实现梦寐以求的

掌握军权，独树一帜的野心提供了良机。

1861年8月，咸丰皇帝病逝于热河，6岁的载淳即位，以载垣、肃顺等八人为赞襄政务五大臣。11月，载淳生母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訢一起发动了宫廷政变，杀害和罢免五大臣，从而夺取了清朝最高统治权。慈禧宣布垂帘听政，任命恭亲王奕訢为执政王，负责主持军机处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慈禧、奕訢为迅速镇压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维护清朝统治，继续依靠汉族地主武装，任命曾国藩统辖江浙皖赣四省军务，并节制自巡抚、提镇以下各员。

1861年9月5日，曾国荃所部湘军攻陷安庆，李鸿章随同曾国藩自东流进驻该城，朝夕会商进军金陵和进攻太平军的计划。当时的军事态势，江苏、浙江的大部分地区仍为太平军所有，湘军要进攻金陵，非有大支劲旅分别进驻苏、浙不可，但湘军力量是显然不足的。所以为补湘军力量不足，利用两淮风气刚劲，编练淮勇，是曾国藩酝酿已久之事。恰好这时，太平军在“合取湖北、保卫安庆”的战役失利后，采取西线防御、东线进攻的战略，击溃东线清军，进克浙东、浙西大部分地区，直捣杭州，威逼上海。上海当时是全国最大商业城市和中外反革命势力汇聚之地。上海官绅面对太平军的凌厉攻势，惶惶不可终日，一面倡议向英、法等国“借师助剿”，建立中外会防局；一面通过湖北盐道顾文彬向江苏巡抚薛焕、团练大臣庞钟璐建议，请求派人立即赴安徽向曾国藩求援。所以，弥补湘军力量的不足，上海绅士的乞师，促成了淮军的编练。

1861年11月8日，由上海道吴煦筹银20万两，雇佣外

国轮船，派遣主事钱鼎铭和知县厉学潮等人以苏浙乡绅名义到安庆向曾国藩求援。但曾国藩顾虑上海同安徽“地处遥远，一旦有紧急事发生，不能相通”，而手下又无多余兵力，于是并未应允援助上海。钱鼎铭探知李鸿章是曾国藩亲信幕僚，深得宠信，于是便亲自登门拜访，请求他帮助劝说曾国藩。李鸿章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多方劝说曾国藩立即派兵助守上海。同时清政府接受大学士、常熟人翁心存的上疏，颁发谕旨命曾国藩速遣大将东下江南，以慰“乡民”之望。至此上有朝廷谕旨，下有江、浙、沪官绅的坚请，再加上曾国藩认真考虑了当时局势，以为湘军正从西线顺江东下，威逼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分兵援沪，“由下捣上”，就可以造成东西两线互相配合形成分进合击之势，逼迫太平军陷于两面作战的困境。曾国藩终于痛下决心拨兵援沪。主意打定之后，曾国藩对领兵援沪的人选问题，作了周密安排。起初，决定派其弟曾国荃前往，进而，他又改派曾国荃为主帅，辅之以李鸿章、黄翼升。但是此时曾国荃心志不在于援沪，而在南京。于是他12月31日写信给曾国藩拒绝援沪，这样，曾国藩不得不派李鸿章、黄翼升先行救援上海。这种变化，为李鸿章创立淮军，掌握兵权、控制饷源重地上海、登上江苏巡抚宝座开辟了道路。因为此时李鸿章手中无可以直接控制和指挥的一兵一卒，而曾国藩的湘军因全力防“剿”各地太平军，没有充分的兵力可供调拨。于是，曾国藩于1861年12月让李鸿章先行回安徽招募淮勇，用以组建援沪之师。李鸿章就是在这种特殊的政治、军事条件下着手组建继湘军之后晚清另一支地主军阀武装——淮军。这也标志着李鸿章政治生涯上升到了一个

新的台阶。

李鸿章奉招募淮勇之命后，回到安徽老家，考虑到“徒党星散”，“立时募练”困难重重，而庐州一带旧有团练较为强悍，自己对当地人情也较为熟悉，所以决定罗致并改编庐州一带旧有团练，组建淮军。他没有返归故里，而是坐镇安庆，通过派人或通信积极与淮南各地团练头目进行联络：一是通过其父文安旧部张树声联络合肥西乡民团头目刘铭传及周盛波、周盛传兄弟；二是通过其门生潘鼎新联络庐江官团头目吴长庆等；三是派人联络其在合肥办团练时的旧部张桂芬、张志邦、李胜、吴毓芬等；四是令其弟李鹤章、李昭庆回乡利用乡族关系募集亲兵。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正式组成一支 5000 多人的军队，当时叫淮勇，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淮军。

这支淮军由“鼎”字营（营长潘鼎新）、“铭”字营（营长刘铭传）、“树”字营（营长为张树声）、“庆”字营（营长为吴长庆）、“春”字营（营长为张遇春）五个营组成。1862 年 2 月下旬，李鸿章所招募的淮勇陆续抵达安庆北门城外驻扎，曾国藩亲临祝贺。李鸿章深知淮勇实力单薄，难膺重任，于是恳请曾国藩调拨数营湘勇，以加强战斗力。根据李鸿章的请求和淮勇实际情况，曾国藩决定从湘军中陆续调拨 8 个营归李鸿章统一节制。这其中有曾国藩的亲兵两营，由韩正国统带，充作李鸿章的亲兵；有曾国荃的“开”字两营，由程学启统带；有滕嗣林、滕嗣武统带的“林”字两营；有由陈飞熊统带的“熊”字营和由马先槐统带的“垣”字营。所有这些，就是淮军初创时期的基干队伍，加上原募 5 个营，共

计 13 个营，6500 人。1862 年 3 月 4 日李鸿章陪同曾国藩检阅铭、鼎、树、庆和程学启、滕嗣林等营，标志着淮军正式建成。

李鸿章组建淮军，虽得到曾国藩支持而较为顺利，但也遇到了困难：一是军心不稳；二是缺乏统帅；三是粮饷不继。但总的来说，淮军的建立不仅扩大了湘军力量，而且也使李鸿章拥有了兵权，为其今后的军旅生涯奠定了基础。

淮军仓促成军，同湘军相比较，有不同的特点。湘军初创之时，兵将均出自湖南，其组建原则是“选士人，领山农”。其将领主要是一些名利熏心而政治地位不高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人生信念在他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忠君”思想极为浓厚。而曾国藩就是依靠程朱理学，以忠君报国的“真诚”、“血性”为精神支柱来统率湘军的。但淮军则不同，李鸿章虽身为翰林，但却鄙薄那些以科名相标榜的人，他重视的不是门第身世，而是才能韬略，所以淮军的将领只知道为李鸿章卖命出力，只知道“感恩图报”讲江湖义气。在淮军主要将领中，只有潘鼎新一人是举人出身，其余的如程学启是太平军降将，品德低下；刘铭传是贩卖私盐的头子，唯利是图观念相当浓厚，却不知多少忠君报国的大道理。至于兵勇来说，湘军士兵一般是山村朴实无华的农人，他们易于接受传统思想的灌输。而淮军主要兵源来自于团勇和太平军降众，可谓“兼收并蓄”，杂凑而成。因此，淮军虽也有浓厚的地方乡土色彩，但较湘军为淡，且其将领不学者多，无共同的最高理想，惟以功名利禄是图，因而军纪与精神远逊于湘军。但是，湘淮“本系

一家，淮出于湘，尤有水原本本之谊”，因而湘军和淮军有基本一致性。如营制饷章、编制训练以及武器装备上，淮军与湘军是一脉相承的。总之，淮军既是对湘军的继承和发展，又不是简单重复；淮军既与湘军有相同之处，又具有本身特点。这与淮军所处客观历史条件和环境有关，也是由它的统帅李鸿章的建军、治军思想决定的。

淮军既已组成，如何从安庆开拔到上海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安庆、上海两地不仅相距遥远，而且间隔太平天国控制区，要突破太平军防线，千里跃进上海，其艰险程度可想而知。曾国藩原拟令李鸿章率军由陆路进军，后因上海绅商出银 18 万两，雇得洋商轮船 7 艘开到安庆，为顺应上海绅民之情，李鸿章与曾国藩经过商议，最后决定“由水路东下，直赴上海”。1862 年 4 月 5 日至 6 月上旬，李鸿章统率的淮军 13 营 6500 人分三批由安庆顺江而东，躲过太平军的监视，抵达上海。临别安庆前夕，曾国藩担心李鸿章因缺乏阅历而摆不正“练兵学战”与“吏治洋务”的位置，因而他告诫李鸿章要把军事放在首位。在他看来，只有练就精兵，学会作战，才能站稳脚跟，飞黄腾达，否则将一事无成，甚至有丧失生命的危险。他又针对李鸿章心高气盛、急躁、傲慢、任性的致命弱点，特以“深沉”二字相劝，其他好友也纷纷提出忠告。李续宜以“从容”二字规之，沈葆楨、李桓以“勿急”相戒。李鸿章深受教益，对于师友们的劝诫，“当奉为枕中秘”。

3. 出任江苏巡抚、赴沪大战太平军

李鸿章到达上海 17 天，清廷即于 4 月 25 日正式任命他署理江苏巡抚，仅仅过了 7 个月，又由署理而被实授为江苏巡抚。“从此隆隆直上”，几与恩师曾国藩“双峰对峙”。此时年仅 40 岁、肩负重任的李鸿章，面临严峻局势，深知淮军驻沪的最终目标就是全力保住上海进而夺取苏、常，将太平军扫除殆尽。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妥善解决军事、吏治、筹饷和洋务等问题。于是他下决心冲破“险阻艰难”，闯出一个新局面，使出浑身解数，尽快扼杀农民起义。

在抵沪就任江苏巡抚后，李鸿章为实现扼杀农民起义的目标，进行了以下几项工作：一是练兵练器，扩军备战。李鸿章进驻上海后，遵循“专以练兵学战为性命根本”的师训，积极“练兵练器”，大力加强军事实力。当时李鸿章虽然身为一省之长，但政令却不出上海孤岛。连成一片的太平天国苏浙根据地，沿江连营、深沟高垒、四面包围，使李鸿章深感强敌环伺，仅凭原有 13 营淮军既无法击退太平军，保住上海，更难以歼灭太平军。因此，他当机立断，把募勇添兵、扩军备战放在一切工作首位。淮军最初的扩营方式是效法湘军的主要方式——“将帅返湘募勇”。此后李鸿章采取了改编原有防军、借将带兵、收编两淮团练和太平军降将的方式，来达到扩充营伍的目的。在 1862—1864 年间，李鸿章就增建淮军营头 30 余个。李鸿章在创立和扩充淮军陆营的同时，也把组建和扩充水师作为扩军备战的一个重要内容。由此可见，李

鸿章扩充淮军，同创立淮军时一样，并未遵循湘军“选士人，领山农”的建军路线，而是以地主团练、太平军降众和旧防军为主要吸收对象。

二是整饬吏治，多方延揽人才。李鸿章认为，江苏和各省一样，官场腐败到极点，而上海尤为突出。其特点是官吏不知礼义廉耻为何物。为了贪财捞钱，他们不惜媚外卖权，从中以饱私囊；为了满足一己之私欲，他们相互勾结，巧取豪夺，置国法而不顾。主观上李鸿章虽很想把江苏一省尤其是上海的官场腐败风气扭转过来，但在客观上却心有余而力不足。因为他初到上海，强龙难斗地头蛇，但为了求得淮军生存，他采取了“有选择地加以惩治”的办法，尽自己的能力对吏治进行了一番整顿。为了使江苏一省的军、政、经济全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也为了将江苏一省的吏治整顿一番，李鸿章千方百计网罗人才，建立和不断充实自己的幕府，被聘入李鸿章幕府的人，一般都各有所能，专长得到较为充分的发挥。

三是多方筹集军饷。曾国藩极力举荐李鸿章援沪，除了单纯的军事和政治目的外，还存在着以上海税收支助湘军的打算。上海自五口通商以后，工商业在外国货物的刺激之下日趋繁荣，海关洋税的收入日渐增多，但仍入不敷出，与所需差距甚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李鸿章果断采取了海关厘税分收分用的政策。从而使得军饷有专拨之款，更主动而有效地控制了饷源。不仅基本上解决了淮军的饷需问题，又以大批金钱和物资支助了湘军在西线战场的作战。

四是在外交上尽力利用洋人势力以为我用。淮军抵沪之

初，太平军势力锐不可挡，李秀成的部队包围了上海附近的青浦，进逼虹桥，距上海城仅 20 公里。上海形势一度处于危急之中，李鸿章决定趁太平军尚未立定根基之时，1862 年 6 月中旬亲督淮军“春”字、“树”字等营分路坚守苦战虹桥、徐家汇等地。结果连战皆捷，300 余名太平军将士被捕杀。随后，李鸿章率兵进占泗泾，迫使李秀成部太平军退弃广富林军处，松江之围遂解。此战，是李鸿章在没有洋兵协助下驻沪第一场胜仗，不但使清廷在上海的统治秩序得以稳定，而且使李鸿章对于统率新成立的淮军提高了信心，同时也为淮军在洋人面前争得了面子。

1862 年 10 月，正当曾国藩兵围南京，李秀成奉命率所部太平军由苏州回援的关键时候，李鸿章勾结英法侵略军和常胜军会攻嘉定获胜。不久，李鸿章又亲赴前线调集常胜军和淮军各路与太平军激战于四江口处，迫使太平军谭绍光等部再次退回到苏州。通过此次战役，淮军进一步巩固了上海周围的统治地位。与此同时，李鸿章加紧对东线太平军进行瓦解工作。1862 年，李鸿章利用早就与太平军败类暗约里应外合的徐佩瑗等人密谋策划，蓄意制造太平军内乱。太平军将领谭绍光发现异，逮捕了徐佩瑗，但骆国忠于 1863 年 1 月发动叛乱。此时，李秀成从天津返回苏州。针对这种情况，李鸿章采取了四处出击战术，一面令骆国忠坚守常熟，一面攻打太仓，于 5 月攻占太仓。太仓失守后，李秀成部被迫放弃原定“进北攻南”计划，赶回救苏州。1863 年 6 月李鸿章决定采取兵分南北中 3 路，“以剿为堵”、“规取远势，以剪苏州枝叶，而后图其根本”的战略。这个战略计划在获清政府允

准后，各路展开了全面合围苏州的攻势。太平军方面，李秀成从天京赶回苏州制定了兵分4路进攻上海、昆山、常熟、江阴的主动破敌计划，但由于太平军内部分化，此计划未能付诸实施，太平军陷入消极防御，被动应战境地。

1863年7月，苏州与杭州的陆路通道被常胜军和淮军程学启部切断；9月，江阴又被淮军李鹤章、刘铭传部攻占。11月下旬，各路淮军与常胜军配合，猛攻苏州娄门，但久攻不下，于是李鸿章策动太平天国纳王郅永宽等于12月发动叛变，杀害了谭绍光及手下兵将数千人，郅永宽等公开投入李鸿章怀抱。然而，当时淮军军心不稳，加之苏州城内尚有10万太平军立誓决一死战，李鸿章背信弃义，把郅永宽等投诚兵将统统杀了。这时，李鸿章因功被清政府赏赐太子少保銜。

后期太平天国政权失去外围最后一个坚强军事据点苏州后，使得清军能集中兵力围攻天京。天王洪秀全错误估量形势，仍决定固守婴城，与清军硬拼到底。1864年5月李鸿章采取主动的战略部署，攻占了常州。随后，李鸿章感到太平军败局已定，于是除了把常胜军精锐归为己有外，其余的都尽行遣散。一切障碍消除后，李鸿章本可以全力以赴会攻天京了，但他害怕因分功而得罪曾国藩，于是仅派遣淮军刘士奇炮队及刘铭传等27营援攻天京，他本人及淮军主力却驻防天京外围一带。1864年7月，天京陷落，坚持14年之久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最终失败了。

李鸿章虽然没有会攻天京，但却对湘军攻陷天京发挥了重要作用。事后清廷“论功行赏”晋封李鸿章为一等毅伯爵，并赏戴双眼花翎。至此，李鸿章从一个怀才不遇的儒生，一

个手中无兵无权的幕僚，踏着太平天国将士的鲜血最终挤进了清王朝封建统治集团的核心，成为一个令朝野刮目相看的重要人物。

4. 督师山东血腥镇压捻军起义

太平天国失败后，各地农民的反抗斗争失去了重心，全国革命形势趋向低落，但与太平军联合作战，彼此声援、互相鼓舞的捻军，仍活跃于山东、河南、江苏、安徽一带，成为当时反抗清朝统治的主力。1864年12月捻军与太平军遵王赖文光部会合，捻军首领张宗禹、任化邦等共推赖文光为统帅，“誓同生死，万苦不辞”。赖文光按照太平军的兵制、纪律和训练方法，整编了捻军，并把“披霜蹈雪，以其复国于指日”作为奋斗目标。赖文光根据捻军精骑善走的特点，创造出的一套步骑结合，灵活机动的运动战术，出奇制胜，击毙了清朝的“剿捻”统帅僧格林沁，打败了曾国藩。但是由于全国革命形势低落，赖文光深感“独立难持，孤立难久”。1866年10月捻军分为东西两支：由赖文光、任化邦率领一支，继续在山东和中原一带坚持斗争，称为东捻军；另一支为张宗禹率领的西捻军。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李鸿章走上了剿捻前线。

1866年12月12日，清政府实授李鸿章为钦差大臣，专办“剿”捻事宜，李鸿章成为“剿”捻主帅。李鸿章负责“剿”捻全权之后，妥善地解决了粮饷供应问题并灵活地实施了“划河圈地”、“以静制动”的战略方针。这是曾国藩所制

定的战略方针，李鸿章在实施此方针时，鉴于曾国藩的军事部署防区太广而不能奏效的教训，提出了“扼地兜剿”的战法，即把捻军“蹙之于山深水复之处，弃地以诱其入，然后各省之军合力，从四面围困之”。

当时李鸿章所面临的作战对象主要是东捻军。李鸿章抵徐州后，东捻军会合西捻军，建立了一个以四川为中心的根据地。李鸿章追随东捻军到达湖北，这里地势对捻军骑兵作战十分不利。李鸿章一方面阻东捻军进入川、陕；另一方面又扼东捻军北上通道。同时集结了一支不下 10 万人的清军，妄图一举将东捻军消灭在鄂东北地区。但此次淮军却受到了沉重打击。

1868 年 2 月 19 日，著名的尹隆河战役开始。在这次战役中，淮军主力铭军几乎全军覆没，而东捻军却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6 月，东捻军放弃入川计划，进入山东半岛，李鸿章获悉后，采取了“倒守运河，进扼胶莱”的作战计划。李鸿章根据刘铭传的建议，修筑长墙于运河之西，扼守胶莱河，企图把捻军逼迫到海边一隅围而歼之。但这次李鸿章又失算了，其胶莱防线最终并未发挥作用。但李鸿章仍坚持原有的扼守运河的战略方针，调遣安徽巡抚英翰手下皖军万余人扼守仰化集，湖北巡抚曾国荃所部湘军扼守靳口至京济闸，张树声等部淮军 5000 人防守齐河，浙军 5000 人防守六塘河，淮军一部和山东军防守运河中段。这样，东捻军虽经数次突围以图西进，但却没成功。9 月，东捻军与清军在宿迁附近的运河边激战，双方都未获胜。此时，东捻军战斗力下降加之内部发生分化，其势力大大削弱。12 月，淮军潘鼎新、刘铭传捕

杀捻军 3 万人于寿光、游河一带，并将原太平天国列王徐昌先、首王范汝增等人杀害。不久，赖文光又被杀害于扬州。至此，东捻军被李鸿章所率的湘、淮军血腥镇压下去。这是李鸿章继镇压太平天国之后的又一次“战功”，被清廷赏加骑都尉世职。

当东捻军在山东被困之际，赖文光曾派人向在陕西活动的西捻军求救。张宗禹闻讯，立即由绥德率军东下，经山西、河南，北进冀中，准备以“围魏救赵”之策，直捣北京，以解东捻军山东之围。1868 年 2 月，西捻军挺进到保定、满城一带，清廷急命剿捻统帅李鸿章北上“勤王”。李鸿章对朝廷的谕旨无法抗拒，只得率师至山东德州，形成与左宗棠驻保定之师对西捻军的合围之势。1868 年 4 月，左宗棠部湘军将西捻军追逼入山东，清廷限定李鸿章在一个月內将其攻灭于海边。此次“剿”捻，李鸿章仍采取以长墙为依托扼守运河的战术，分遣各部淮军堵剿黄河、运河通道，形成合围之势。连续 16 昼夜，西捻军被追击得精疲力尽，无力回手。7 月中下旬，西捻军连遭惨败。8 月上旬，西捻军遭淮军左右夹击，首领张宗禹受伤败于高唐。在黄河、运河之间又被追杀，最后被迫投水自杀。至此，西捻军在湘、淮军的夹击下惨败。李鸿章又被清廷加恩授予协办大学士之职，赏太子太保衔。

综观李鸿章的军旅生涯，他之所以能从一个典型儒生到领兵数十万的清王朝封建统治集团内的核心人物，除了个人的“奋斗”以及老师曾国藩的栽培，更主要的是特定的时代环境为他在政治上发迹提供了条件，即所谓的“时势造英雄”。太平天国、捻军等农民起义威胁了大清王朝的专制统治，

李鸿章抓住时机，立马站到维护封建统治和封建文化的立场上，与农民起义军为敌。经过数年拼搏，李鸿章在处世治事、个人修养等方面逐渐成熟起来。他通过对农民起义军的镇压，为清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从此，他官运亨通，荣宠异常，这段经历为他后来位极人臣，成为主持清政府内政、外交数十年的显赫人物提供了资本。与此同时，又由于他在这时期与洋人打交道较多，对西方文化了解、接触较早，为他以后开展以“求富”、“求强”为最终目标的洋务运动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三、“自强”、“自富” ——投身洋务运动

1. 兴办近代军事工业以求“自强”

李鸿章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建立了一支用西式武器装备起来的淮军。与此同时，他还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以求得中国之“自强”。可以说：中国近代军事工业的兴起，主要是由李鸿章开始的。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主持总理衙门的奕訢、文祥等人，鉴于清王朝内忧外患频纷，就积极提倡以“练兵”、“制器”为主要内容的所谓“自强之道”。在地方上倡导这一主张的则有曾国藩、李鸿章和左宗棠等人。其中以李鸿章倡导最力，动手最早，经办最多。这一方面决定于他胸襟开朗，不拘成法，更主要决定于他在上海“华洋会剿”期间的实际体会。

1862年4月，李鸿章率淮军先遣队抵达上海。抵沪之后，他看见外国枪炮性能优越，杀伤力强，而中国人所生产的军工产品却质量低劣，令人悲哀。同时他又发现“太平军中专

用洋枪，尤其是李秀成所部洋枪最多”。考虑到作战需要，李鸿章认为淮军要制服太平军必须多用洋人军火。当时，上海的“常胜军”部队的军官全由西方志愿者担任，还配备了外国枪炮，这一切使李鸿章很快意识到外国人和他们的先进武器构成了对中国的长期威胁。因此李鸿章一面尽量把外国人的干涉和影响减少到最低程度，一方面极力争取得到并再生产外国人的先进武器。经过李鸿章的努力，1862年10月初，华尔向他表示，同意为中国雇用生产弹药的外国技术人员和购买轻型武器。同时，李鸿章通过他在广东的哥哥李瀚章，利用地近香港、购买外国武器较为方便的条件，购买了大量的西方新式枪炮，不仅用来武装改编后的淮军，而且分拨给曾国藩、曾国荃的湘军使用。于是在1862年6月，李鸿章的淮军里面出现了洋枪队。

1862年11月，李鸿章接到一份诏书，命令指挥官指派中国人学习外国弹药的生产技术。随后，李鸿章开始跟有军工经验的英、法军事人员接触，目的是要模仿他们的生产。由于李鸿章与外国军队的频繁接触，使他对外国武器的效力更为推崇，更加坚定了自己生产西式武器的决心。1862年10月，由韩殿甲领导的技工在李鸿章的军费资助下，开始生产炸药及雷管。

1863年，李鸿章雇用英人马格里会同直隶州知州刘佐禹，首先在松江办了一个洋炮局，制造炮弹铜帽等军用品，这是上海最早的洋炮局。同时，1863年9月，李鸿章专折奉调丁日昌到达上海，又建了一局，仿造短炸炮以及各种新式炮弹。这样，韩、丁、马三局先后成立，李鸿章把它们合称为

上海“炸弹三局”，时人又称为上海洋炮局。这三个炸炮局，以马格里、刘佐禹主持之局最为先进，使用西洋机器，并用蒸汽机为推动力，“雇用洋匠数名，照料铁炉机器”，又选募中国各色工匠，帮同工作，铸造炸炮。韩殿甲和丁日昌分别主持的炸弹局，“都不雇佣洋匠，只选中国工匠，仿照外洋做法”，分别用手工铸造炸炮。这三个炸炮局所造的炮，大多限于轻便的短炸炮，炮重不满 50 斤，每月只造 6 至 7 尊。炸弹则每月可出产万余颗。这些枪炮，主要用于淮军各营与太平军作战，同时也有一部分拨济湘军曾国荃部。

1864 年，淮军攻占苏州，李鸿章把马格里、刘佐禹主持的洋炮局迁往苏州，成立了苏州洋炮局。地址设在太平天国纳王府，占地比上海大得多。这期间，马格里通过李鸿章的允准又从外国购买了一批机器，规模扩大，生产也频有成效，每一星期就可以生产 1500 到 2000 枚枪弹和炮弹，还制造了规模不同的开花炸炮。对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奕訢在 1864 年 5 月奏请朝廷允准，从保卫宫廷的火器营中选出了 8 名武弁、40 名兵丁前往苏州洋炮局学习。于是李鸿章成了让人们刮目相看的洋务派首领之一。

1864 年 5 月，同太平军作战即将结束，李鸿章再次强调制器之不可缓。他在致总署函中说：“前者英法各国以日本为外府，肆意诛求，日本君臣发愤为雄，选宗室及大臣子弟之聪秀者往西国制器厂师习各艺，又购制器之器在日本制造，现已能驾驶轮船造放炸炮。去年英人虚声恫吓，以兵临之，然英人所恃为攻战之利者，彼已分擅其长，由是凝然不动，而英人固无如之何也。”“日本以海外区区小国，尚能及时改辙，

知所取法，然则我中国深维穷极而通之故，夫亦可以皇然变计矣。”

1865 年，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鉴于原设三个洋炮局的设备不齐全，便在曾国藩的支持下，购得上海虹口美人旗记铁厂一座，与原设在上海的两个洋炮局合并，扩建为江南制造总局。江南制造总局规模极大，该局以江海关二成洋税为底款，作为常经费，以制造军械为主。江南制造总局共设五个分厂：一是制造枪炮的军火工厂；二是制造轮船、修理船舶的船厂；三是炼钢厂；四是火药厂；五是机器制造厂。除此之外，该局还附设了译书局，专门翻译外国书籍。该局坚持“自立”、“自强”的主旨，从经费的筹措、机器设备的购置、管理人员的委派到洋匠的雇佣、机构的设立等问题，李鸿章和曾国藩都要过问，可谓费尽心机。1867 年夏天，江南制造总局从虹口一带迁至高昌庙，规模又有所扩大。经陆续扩充和添置设备，到 80 年代上半期，已拥有各种工厂 10 余座，船坞一座。1867 年，用原有购置的设备，并自造一部分机器，每天已能生产毛瑟枪 15 支，12 磅开花弹 100 发；每月平均生产发射 12 磅炮弹的开花炮 18 门。自 1867 年至 1894 年 27 年间，该局共计生产各种枪支 5 万多支，大炮 585 尊，水雷 563 枚，炮弹 12 万多颗。这些武器弹药除供应淮军外，还供应南洋系统及各地的炮台、军舰，各总督所辖地区的军队。这些军工产品统一由清政府调拨，不具有商品性质。最值一提的是江南制造总局一开始就专设了一个制造轮船的分厂。李鸿章与曾国藩当时都清醒地认识到：为对付西方列强，必须多造兵船，以防御各海口。于是曾国藩奏准另拨江海关

两成洋税，以一成留作江南制造总局专造轮船之费。造船业于 1867 年正式开展，轮船的部件，或由自己制造，或向外国购买。1868 年，江南制造总局造出了近代中国第一艘大型新式兵轮。

1863 年 11 月，曾国藩从两江总督任上调赴徐州前线为钦差大臣，全力主持“剿捻”事务，李鸿章也移至南京，这样，苏州洋炮局又迁移至南京，改为金陵机器局，又称金陵制造局。该局局址设在南京中华门外的瓷塔山，规模又有所扩充，设备有所改进，到 1879 年计有三个机器分厂，翻砂、热铁、柞厂各二个，还有火箭局、洋药局、水雷局等；能够制造炮位门火，车轮盘架，子药箱具，开花炮弹、洋枪、抬枪、铜帽、大炮、水雷等。

1870 年，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对崇厚所办天津机器局进行了接管并加以扩充。天津机器局在李鸿章的经营之下，分设东西两局，规模比以前大得多，主要生产火药、枪弹、炮弹、水雷等，辅之以修造船舰等。产品主要供应淮军以及北洋水师之武器装备。

李鸿章创办及接办的这几个制造局，再加上 1866 年左宗棠创办的福建船政局，成为中国早期军事工业的主干。在它们的影响和带动下，全国许多省分也都先后以“机器局”、“制造局”的名义，相继设立了军火工厂，但一般规模都较小，有些维持不久就停办了。只有广州机器局、湖北枪炮厂发展到较大规模。这些军事工业，不论大小局，一律都属于官办企业，产品直接拨给军队，不计成本，不作为商品出售，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上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腐败现象，并且在生产

资料和技术上对资本帝国主义有很大依赖性。但是，他们已不同于旧有的官营工场手工业，就其使用新机器、雇佣大量工人、大体上按照西方的机器工厂的组织形式进行生产来说，已带有资本主义企业的性质。由于这些军事工业的创办，也多少改变了清朝军队专持刀矛弓箭、帆蓬舟楫的落后状况，为中国国防近代化奠定了基础。

综观李鸿章为实现“自强”而兴办近代军用工业的过程，从他购买船炮到仿而制造，其性质究竟是为了镇压国内人民反抗还是为了“自强”而抵御外侮呢？从以下几方面我们可以看出后者是主要方面。首先：不论是金陵制造总局、江南制造总局还是天津机器局的兴建和扩大，都是在太平天国、捻军等农民起义败局已定的情况下，所以，如果李鸿章为对付农民起义而制造枪炮，是没有多大必要的。相反的，从前述促使李鸿章设厂制器的原因来看，“自强御夷”的目的是主流。其次：李鸿章等人从购买船炮到自行制造的举动，为中国近代社会带来了一种实实在在的新生产力，并且为中国近代工业的产生开了新风气。江南制造总局开局之初，就有过“各委员抨考图说，以点线面体之法，求方圆平直之用；就厂中之洋器，以母生子，触类旁通，造成大小机器 30 余座的事实。这种先进的制造之器，虽然由船炮引入，并在生产船炮的过程中被复制出来，但它一经出现，就会在数量上积累，而且按照自身规律运动，或迟或早突破其倡发者狭隘的预想。这是李鸿章等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为中国近代工业发展所作出的一大贡献。第三：因制造船炮并为其服务的各项专门化技术工业的产生，对促进中国封建的自然经济的解体和新的近

代经济的产生和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19 世纪 60 年代以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完成了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生产力得到了巨大发展，开始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可是，中国当时社会生产力相当低下，虽然在 19 世纪 50 年代已经出现了一些工矿企业，但它们基本上是由买办资产阶级所创立，并且规模很小，为缩小与西方国家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只能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不可否认，李鸿章主持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内生产的枪炮，在最初当然主要是运往前线对付农民起义军；但这些工厂的主要宗旨却是制造兵船，目的是防御海口用以“自强御夷”。再加上这些工厂由中国人拥有主权，自己建造和管理，所以，这些工厂尽管属于军事工业之类，却具有“御侮”性质，并且为中国近代工业打下了最初基础。总之，在 19 世纪末年，中国近代工业虽发展缓慢，底子薄，基础不牢，并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外国资本主义，多少带有买办性，但在由李鸿章主持下的江南制造总局等企业的倡导和支助以及影响下，中国近代工业已经诞生并缓慢而艰难地前进，所以李鸿章设厂制器的功绩是不可抹杀的。第四，这些军工企业虽在“靖内”方面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但在“御外”方面的实际效果也极为明显，我们不能把李鸿章主持兴办的军事工业看成绝对的坏事。而也应看到其积极作用。如 1870 年李鸿章接管并扩充的天津机器局，起初虽然是为镇压农民起义而制造军火的，但随民族矛盾上升，这些军事工业所制造的枪炮弹药在加强边防、抵御外来侵略战争中发挥了作用。又如，在江南制造总局内专设的轮船工厂，为中国近代海防和海军建设作出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综上所述，对于李鸿章举办军事工业中的是非得失，我们只有从它的客观效果出发去评价，我们应肯定它的积极意义，虽然它于 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北洋舰队全军覆灭而告失败，但它为百十年后“开拓始基”所作的尝试，在促进中国国防近代化方面的重要意义都是不可抹杀的。对于它失败的根本原因，我们应从当时中国政治的腐败和经济的落后上去寻找。

2. 兴办近代民用工业以求“自富”

李鸿章推行以学习西方技术为目标的富国强兵之策，60 年代着重在创办近代军事工业，从 70 年代起，他又提出“寓强于富”的口号，办起了军事工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来，主要是兴办以“求富”为目的的民用工业。

李鸿章从所谓“求强”出发，把西方军事工业移植过来，力图加强清王朝的武装力量，抵御西方列强的入侵。然而，军工企业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是整个政治经济体系中的一个环节，把这个环节孤零零地摘取下来，移植到中国，由于缺乏社会经济发展的稳固基础，结果发生了许多畸形现象和一连串的困难。经费来源枯竭，原料燃料供不应求，转运维艰，技术落后，人才缺乏，管理制造混乱等等，堵塞了军事工业进一步发展的通道。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为军事工业建立完整的近代工交体系。因为“武器的生产”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的。于是围绕军事工业而兴办民用企业以及其他工业的问题被提到日程上来。此时的李鸿章经过大量实践，逐

渐认识到“必先富而后能强”。为了“求强”而“求富”，他决定通过兴办民用企业，以解决军事工业的原料、燃料供应、“调兵运饷”的交通运输困难和“练兵练器”的经费问题。而当时的中国也具备了发展民用企业的客观条件。自然经济加速解体、城乡个体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日益分离，大批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失业，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市场逐渐扩大。从外国资本的侵略掠夺中，产生了中国的买办和买办资本。从中国的封建压榨中，增加了地主、官僚和商人的财富积累。外商在华投资设立资本主义企业及其一诺千金，转手致富的现实，刺激着地主、官僚、买办、商人投资新式企业、追逐高额利润的兴趣。在以上主客观条件的推动下，李鸿章开始把兴办民用工业求“自富”最终求“自强”的思想付诸于行动。恰好在这时，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一场关于是否继续造船的争论。这就成为了李鸿章等洋务派从“求强”到“求富”、从经营军工企业到兴办民用企业的转折点。1872年，内阁学士宋晋上奏，借口制造船舰浪费钱财太多而成船太少，请求饬令福建、上海两船政局暂行停止制造。清政府令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楨等人通盘筹划具奏。在复奏中，左宗棠、沈葆楨都反对宋晋的主张，改为“兵船为御侮之贤”，不能因惜费而停造，但他们没有提出解决经费问题的办法。李鸿章在阐述继续制造船舰的必要性之后，针对经费解决提出了两条具体办法：一是裁撤沿海各省的旧式艇船而代之以兵轮，把修造艇船的费用拨归制造兵轮；二是闽、沪两局兼造商船，华商应当同垄断中国航运业的洋商进行竞争，以成立公司，自建行栈，自筹保险来保障这一竞争的顺利进行。进而，他提

出了用西法开采煤铁以“与船器相为表里”的主张。而船炮机器之用，没有铁是不能成功的，没有煤也无济于事。他警告朝廷：如不“因时为变通”，而“徒来于墨守旧章，拘牵浮议”，那么什么事也办不成，“坐让洋人专利于中土”，后患是不可设想的。于是他希望清政府能尽快允准“创设招商局”。经过李鸿章、左宗棠和沈葆楨等的力争，清廷不仅否定了宋晋的停造轮船的主张，而且为洋务派兴办轮船招商局和用西方采煤炼铁开了绿灯。至此，李鸿章正式开始兴办民用企业求“自富”。

（一）创办轮船招商局

轮船招商局是洋务活动由军工企业转向民用企业，由官办转向官督商办的第一个企业。1872年8月，李鸿章令浙江海运委员、候补知府朱其昂负责筹办轮船招商局。根据李鸿章的嘱咐，朱其昂很快拟定了《招商章程》20条，主张官商合办。但李鸿章认为现在没有官府的轮船在内，不必官商合办，应当实行官督商办。1872年10月在上海开始筹备，于12月正式成立。轮船招商局先后任用买办出身、熟悉业务、懂得竞争的唐廷枢、徐润、郑观应等人。此外，李鸿章还在天津、汉口、广州、香港等地设立分局。招商局的开办，目的在于扩大财源，但却突破了外国侵略势力对中国航运业的垄断。它自创办之日起，得到了李鸿章的多方关注，该局成立之初，只有轮船3只，到1887年达33只。此后始终徘徊在这个水平上，至1893年拥有轮船26只。这个时期，它主要经营沿海与内河航运，水脚收入每年平均为2百万两左右，除去轮船费用、折旧提成等开支外，每年净利达30万两左右。

轮船招商局开业后三年，从外国轮船公司手中挤掉 1300 万两的利润，迫使美国旗昌洋行退出竞争。轮船招商局为争回中国的航运权、发展民族经济和保卫国防方面产生了积极作用。但轮船招商局也存在不足并最终导致了它的失败。在轮船招商局存在的 20 多年间，从整体上说它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但其经营管理技术却存在严重的缺陷，从而使企业失去生命力，得不到应有发展，导致最终失败。本来，轮船招商局在 1887 年收购美国旗昌公司产业之后，拥有轮船 33 只，总载运量达到约 2.4 万吨，成为该局发展规模的顶点。但这期间，它很少进行资本积累，它的总办和会办等人只顾眼前的直接利益，而忽略了企业的长远前途。这使得轮船招商局无法凭借雄厚的资金扩大再生产，没有能力长时间与外国航运公司相抗衡，更没有能力在远洋航线上和外国资本竞争。所以，经营管理不善和对资本积累的忽视，是导致轮船招商局远洋航运完全失败的原因所在。此外，封建顽固势力的钳制和掣肘，也是轮船招商局失败原因所在。

（二）创办开平矿务局及漠河金矿

洋务运动开始后，各地兴办的军事工业和后来兴起的民用企业，对煤铁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土法生产的煤铁不仅价格昂贵，而且质量也较差，所以，只得向外商购买才能维持正常生产。根据当时一些材料统计，中国各通商口岸每年共进口煤炭数 10 万吨，以供应本国的军事工业及其他少数民用企业的需要。于是，在大宗煤铁从外国购运而来的同时，大笔银钱源源不断地流向了外国人的腰包。因此，不论是从抵制外商侵略还是从中国的经济和军事的角度来考虑，采用近

代化手段来开采中国的煤铁矿藏都是一个刻不容缓的急需解决的问题。

李鸿章在实践中感到：“天地之间，大自然赋予的宝藏，才是老百姓日用的来源。”他认为每年都要拿出大笔银钱来向外国购买煤铁，这是一个很大漏洞！从而他决心利用自己的职权来倡导、主持中国近代矿产业的开采。开平矿务局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由李鸿章奏设的。目的在于：“中国兵商轮船及机器制造各局用煤，不致远购于外洋，一旦有事，庶不致为敌人所把持，亦可免利源之外泄。”在他看来：“中国富强的基础，就发端于这里。”他于 1876 年派唐廷枢前往开平勘察煤铁矿产资源。第二年批准唐氏提出的开采开平煤铁的计划，并委派他负责该项工作。为了得到地方官吏的配合，还增派前天津道丁寿昌和天津海天道黎兆棠会同督办。1878 年正式成立开平矿务局，官督商办。1879 年，煤矿开始凿井，1881 年，正式出煤，年产量 3 万多吨，到 1894 年，年产量已发展到 70 万吨，相当于现在的中型矿井。该局起初煤铁并采，兼炼钢铁，后因经费和技术问题，遂停炼铁，专采煤矿。开平矿务局是洋务派创办的采矿业中最卓有成绩的大矿。该矿用机器采煤，逐渐配备了铁路、运河、专用码头及堆栈，在中国近代，影响较大。

开平矿务局开办的直接目的就李鸿章等人的初衷来说，一是为了解决国内轮船、机器的燃料问题；二是同洋人“争利”。从实际情况看，第一个目的完全达到，第二个目的也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19 世纪 80 年代以前，各通商口岸所需煤炭差不多全为洋煤所垄断，整个天津市场又是日本煤炭的畅

销场所。所以，当开平煤炭投入华北市场之后，就立即引起了日本侵略势力的重视，并迅速采取对策，企图挤垮开平矿务局在华北的市场。开平煤矿以低于日本煤矿的价格处于有利地位。此后，洋煤进口量逐渐下降。到 80 年代末期，天津就不再进口洋煤了。此外，开平的煤矿还源源不断地运到国外和香港等地。由此可见，开平矿务局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外国煤矿的涌入。

由于轮船招商局的发展和开平矿务局的成功，李鸿章还以极大的热情倡办金属矿。关于兴办金属矿的直接动机就是“求富”，解决已办各厂的原料和资金；对外“自强”，夺取洋人之利。1881 年，李鸿章在请求开办平泉州铜矿的奏折中指出：“天津机器制造局制造子弹、药帽等，所需要的铜料，都要从外洋购买，运输很不方便，价格昂贵。而且，不能长久依赖于洋人。中国应当设法开办自己的矿产，以节省费用，并使用方便。”李鸿章从“求富”和“自强”这一根本信念出发，从 1881 年 5 月开始至 1891 年止，先后开办了热河平泉铜矿、山东平度金矿、黑龙江漠河金矿等等。其中较为成功的是漠河金矿。

漠河金矿，是李鸿章等奉旨创办的官督商办企业。漠河地处我国东北的极边，北隔黑龙江，同沙俄毗邻。19 世纪 80 年代实有不少俄国人成群结队，非法越境来到漠河一带采挖金矿，严重侵犯了中国的领土主权。1885 年，黑龙江将军派兵驱赶非法入境的俄国人，并上奏请清廷拟由中国人自行开采。1886 年，清政府从“杜患防边”出发，决定开采漠河金矿，命令李鸿章与恭镛选“熟悉矿务干员”，前往矿区勘察。

李鸿章等遵旨委派道员李金镛负责此事。李金镛奉命后赴黑龙江，深入矿区作实地调查，在 1887 年 1 月向李鸿章呈交了开办漠河金矿的 16 条章程。李鸿章根据这个章程所涉及的内容，与恭镈进行了反复磋商。1887 年 1 月，李鸿章正式奏准开办漠河金矿，任命李金镛为总办。1889 年，漠河金矿正式开办，招收工人 500 多名，开办当年，产金 1.8 万余两，以后日益增多。

从以上所述的事实我们可以看出，李鸿章在中国近代矿业史上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首先他开办的众多矿业，有成功的有失败的。但都促使人们扩大了政治视野，从关心国家民族前途命运出发，认识到只有以开矿为契机建立起庞大的重工业体系，中国才有希望走上民富国强的道路。其次，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在兴办矿业过程中，不仅为中国社会带来了西方国家新机器、新知识、新技术，造就了一批近代化矿业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而且开始改变了人们头脑中那种手工采挖的落后经营方法和满足自给自足的思维方式。第三，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所办的新式矿业，不但保护了中国工矿权益，而且因在国际市场上获取利益为中国争得了荣誉。

总之，李鸿章在兴办中国近代矿业问题上，主张向西方学习，在晚清官僚士大夫中是不多见的。他为近代中国矿业的兴办所进行的反复宣传，所付出的巨大心血，所产生和形成的理论和实践经验，为 20 世纪中国矿业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李鸿章的功绩是磨灭不掉的。

（三）创办电报、电话等通讯服务事业

在近代中国，向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学习，创办近代化的电话、电报等通讯服务事业，亦是洋务运动中一项重要内容。它的最初提倡者是沈葆楨、丁日昌等人，而首先实办的，却是李鸿章。

李鸿章曾经以为电线“有害于中国”，但在1879年，却改变了态度，认为电讯事业，不仅对“富国”有重大意义，而且是“强兵”的必要手段。他曾说：“用兵之道，必以神速为贵。”他曾未经清政府允准，在大沽北塘海口炮台和天津之间架设了一条长约40英里的军用电线，从而为80年代较大规模地举办电信事业积累了一定实践经验。

1880年9月，李鸿章以电报有利于防务、便利通讯为由，奏报天津至上海架设电线，以使南北声息灵通。由于李鸿章把架设津沪电线的道理说得具体明确，也由于电报在防务和洋务交涉中的重要性日益显示出来，清政府很快批准了这一请求，即命“妥速筹办”。于是李鸿章于1880年设立了天津电报总局，任命盛宣怀为总办，并设立了7个分局。经过几年努力，初步形成了能达半个中国的电报网。1881年李鸿章接受盛宣怀的建议，仿照轮船招商局的办法，募集商股，决定自建津沪陆线。同年，津沪陆线建成，使南北洋讯息相通，“调兵馈饷”，大为便捷。此外，李鸿章以加强防务为由，又先后奏设了许多军用线。如天津至旅顺口线、营口至盛京线、奉天到吉林线、福州到台湾线、新疆南北两线等。总之，从19世纪80年代初至1895年止，经过10多年的修建与扩充，中国的电报（电讯）事业有了长足的进展。初步形成了一个“殊方万里，呼吸可通”的电讯网。电报局不但承接本国业务，

而且还兼办洋人通讯的电视网，范围不断扩大。

由李鸿章倡导、主持的中国第一个电报局和近代中国最高的电报、电信事业，是在有利于军事通讯，从洋人手中争夺利益的环境和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具有爱国民族意识。在此过程中，李鸿章利用“官”的力量，支持了“商”的发展，采取各种方式维护商人利益，使中国电报事业在官方的支持下发展起来。相反的，如果没有官方在经费上的支持，中国电报事业是难发展起来的。这些都是李鸿章所做的有益于民族的事，我们应该肯定。然而，由于历史的局限，李鸿章在倡导、主持中国最早的电报事业过程中，把电报同他本人和本阶级政治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如在有关电报局的内部人事安排上，大都是用人惟亲，以致于一些庸人充斥其间，较大程度上影响到企业的管理先进性，极大地阻碍了企业的发展。这都明显地体现出李鸿章身上有相当浓厚的封建官僚气息，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认李鸿章在中国电报事业发展史上所做出的贡献。

（四）创办铁路

在中国最早主张兴修铁路的人并非李鸿章，而是入侵中国的西方列强。两次鸦片战争之后，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为便于在华推销商品，掠夺原材料，扩张侵略势力到中国内地，他们开展计划在中国修筑铁路。可见西方列强在中国修建铁路，并非要帮助中国富强，只不过是为了扩大它们的在华侵略罢了。早在 19 世纪 60 年代，李鸿章就坚持应以中国人来修筑铁路，不能让外国攫夺路权。据肯德在《中国铁路发展史》一书中记载，李鸿章曾向英法等国领事团

表示：“只有中国人自己创办和管理铁路，才会对中国人有利；并且中国人坚决反对在内地雇佣许多外国人；而且一旦因筑路而剥夺中国人民的土地的时候，将会引起极大的反对。”他认为有反对外国人追求铁路让与权的企图的责任，因为这种让与权将使他们在中国取得过分的势力。可见，很早李鸿章就有自办铁路的想法了。但因考虑到财力和物力有限，一时铁路不能由中国人来制造。到19世纪70年代，随着洋务运动的进一步深化，李鸿章这个由中国人自办铁路的念头进一步深化而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李鸿章倡导铁路也经历了坎坷道路。由于遭到极端守旧势力的强烈反对，进展十分缓慢。从19世纪70年代起，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国际上，自由资本主义已经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越来越加剧对中国的侵略，中国的边疆危急局势到了空前的程度。为了加强国防建设和解决洋务军事工业原材料的供应问题，李鸿章决定倡导建造中国铁路。

1874年，李鸿章乘赴京叩谒同治皇帝梓官之机晋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奕訢，“极陈铁路利益，请先造清江至北京铁路，以便南北转载运输”。但奕訢却以“天下无人敢出来主持这件事”及“两宫太后也不能决定此等大计”为由，拒绝了李鸿章的想法。李鸿章感慨万千，发誓“从此就绝口不谈修铁路”这件事了。然而，他感到中国交通阻滞，调兵运饷，缓不济急，同时他考虑到军事工业尤其是煤矿之类民用企业，产品产量激增，急需解决运输问题，并且此时的他逐渐意识到“求富”与“求强”的内在联系，意识到经济力量是国防

力量的基础，只有发展经济，才是中国由弱变强的主要途径之一，因此，尽管他提出修建铁路的主张一再碰壁，他仍在等待时机兴建铁路。

1876 年，丁日昌受命为福建巡抚后，秉承李鸿章的旨意，上疏建议在台湾修筑铁路以防外安内。李鸿章和沈葆楨一致支持丁氏的主张。1877 年，清政府批准了丁日昌的建议，要他“审势地势，妥速筹策”。这是清政府首次批准在台湾修建铁路的命令。李鸿章非常高兴，写信支持和鼓励了丁日昌。但这次修筑台湾铁路的计划，虽经清政府批准，终因费绌而中止。此后，李鸿章又多次主张在东南和西北两个地区修铁路，以解决海防和边防问题。由于阻力过大，一直未能实现。1880 年，淮军大将刘铭传上折，请求修建铁路。李鸿章见自己授意之事业已提出，立即写了一篇 4000 字的奏折，支持刘铭传的建议。他指出，西方之所以强大，铁路的四通八达是一个重要原因。中国欲富，也应抓紧修建铁路。他们的建议，遭到顽固派的强烈反对，顽固派提出几十条理由反对修铁路，他们甚至搬出先辈祖宗及山川之神来威吓。同时，洋务派内部意见未能统一，刘铭传被迫收回修铁路的建议。但李鸿章为开平矿务局的运煤方便，不顾顽固派的强烈反对，于 1881 年修建了唐山至胥各庄的铁路。1886 年又向西延长至芦台，长 85 公里。1887 年，再从两端分别延至古冶和天津，这是中国修建成的第一条铁路。1890 年，因东北局势日紧，改建关东铁路。至 1893 年修通了天津至山海关路段，后又向关外延伸了 64 公里。尽管为数甚少，但多少也增强了沿海军用运输的能力。在 1894 年中日战争爆发前夕，林西至山海关全长 100

多公里正式通车。李鸿章在校阅北洋海军之后，从山海关乘坐火车回天津，他怀着异常兴奋的心情说：自山海关至天津“600余里，半天就可以通达，极为便速。沿途阅视所作桥轨工程，均极坚稳，每里工价，较之西方国家更为节省”。后来，由于清政府随意挪用经费筹办慈禧太后60寿辰庆典，所以关东铁路无法进一步延伸下去，加之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全路接续工程被迫停止。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中国近代铁路建设是在李鸿章的倡导和努力之下揭开序幕的。换言之，近代中国第一条铁路和第一个铁路的公司与李鸿章的关系密不可分。在100多年前的中国社会，封建势力空前强大，反对铁路的呼声甚嚣尘上。在这种背景之下倡导和主持修建铁路，体现了李鸿章的远见卓识和追求新事物的百倍勇气。李鸿章作为洋务运动的主持者之一，敢于承认中国不如西方的地方，勇于学习西方长技。为了中国早日自立、自富、自强，他认识到兴造铁路有利于抵抗外国的军事侵略和经济掠夺，即使是遭受到种种人身攻击，处于极为不利的困境之中，他也没有灰心和退却，而是利用他的地位、名声和诸多关系，顶住逆流，充分捕捉住各种有利时机，将近代中国铁路建设逐步推向前进。尤其是在1881年至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前的10多年时间里，李鸿章主要依靠中国自身力量，总计在北方修建了300多公里长的铁路线。尽管在修建铁路的过程中，他曾雇佣少数洋人工程师，可是这些人仅从事技术工作，无权过问招工购料、人事安排等属于中国主权方面的事务；尽管为修路举借过洋债，但数额不大，期限不长，利息也不太高，并无折扣

和趁此损害中国主权的附加条件。总之，铁路所有权和经营权以及管理权属于中国，外国人无权插手，这些都反映了李鸿章的爱国民族意识。此外，尽管近代中国铁路建设的步伐非常缓慢，经济效益一时未能在较大程度上发挥出来，但其意义却远不止于建造铁路的成效本身。更为深远的影响在于：铁路的兴办对中国传统封建思想文化是一个有力的冲击，促进了煤矿业和其他工业的发展，为近代中国社会培养和造就了第一代铁路工人和技术人员。李鸿章所做的这些贡献，是不可抹煞的，我们必须加以肯定。

（五）创办棉纺企业——上海机器织布局

中国近代棉纺企业，与轮船招商局、天津电报局等新式企业一样，也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棉纺织业的欺凌刺激下产生的。

1840年鸦片战争前夕，机器纺织品在中英双方贸易中地位并不十分突出。到了19世纪60年代开始，棉纺织品在英、美等西方国家对华输出的商品中日益占居重要地位。由于外国棉纺织品侵入内地，中国棉纺织业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为数众多的手工业者陷入破产或半破产境地。此外，西方列强还勾结买办势力，利用中国的原料和廉价劳动力，非法在中国设工厂，以获更大利润。针对这种危及中国轻纺织业生产的严酷现实，李鸿章越来越认识到与西方列强进行“商战”的必要性。基于这种认识，李积极着手筹建上海机器织布局。

1879年初，中国近代第一家棉纺织企业——上海机器织布局，购买了虹口一家银行的货栈作为基地，着手兴办。李鸿章任命郑观应为会办，唐汝霖、卓培芳、长康为帮办。在

筹办过程中，因会办郑观应挪用股本进行投机暴露，曾一度停顿。1879年秋天，李鸿章又委派浙江候补道戴景冯“就近兼理”上海机器织布局事务，委派吴仲春，龚寿图两个道员会同办理。但由于这些人缺乏管理新式企业的经验，在主持局务的一年时间里，招股集资的工作毫无进展。到1890年10月李鸿章改派轮船招商局会办之一的马建忠接办局务，允许他挪用仁济和保险公司公积金30万两作为周转基金。马建忠接任后，垫付旧款，添买新机，修造厂房，终于使上海机器织布局在经过10余年的筹备之后开机生产。所用机器包括由英、美购置的轧花、纺纱、织布各机全套，纺锭3.5万枚，布机530台，雇佣工人约4000名。投产后，营业兴盛，利润丰厚。1893年10月，由于经营管理混乱，工厂失火，全厂被毁，在艰难中发展起来的中国近代第一座大型纺织厂毁于一炬。

上海机器织布局虽被大火焚毁，但它的丰厚利润及与洋人争利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吸引和促使着李鸿章重整旗鼓、继续开办的决心。经过一年时间的紧张筹备工作，1894年9月，华盛机器纺织总厂成立并部分投入生产，有纱锭6.5万枚，布机750架，工人4000余人，规模比上海机器织布局更大。但由于商人不敢贸然入股，李鸿章只得动用官款加以扶持。从而原来上海机器织布局那种官督商办的性质发生了变化，逐渐转变成从官办为绝对优势的企业。1901年李鸿章去世之后，主持人盛宣怀借口华盛机器纺织厂亏本太多，要实行招商顶替，改名为“集成纺织总厂”，不久又改名为“又新纺织总厂”。所谓招商顶替，实际上是盛宣怀个人资本居多，至此华盛机器纺织总厂由官办又转化为买办资本性质的企业。

李鸿章倡办、支持开办的中国近代棉纺织业，不仅为 20 世纪初中国棉纺织业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而且也表明李鸿章作为封建统治集团的一员，能够在当时那种守旧气氛相当浓厚的环境和条件下，比较自觉地引进西方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促使人们进一步摆脱小农经济、重农抑商观念提供了一定的思想基础。由此李鸿章在中国棉纺织业发展史上的功绩是不可否认的。

以上五个方面是李鸿章兴办民用企业及其他工业的主要内容。李鸿章从办军事工业，转向创办“寓强于富”的民用工业，说明他已认识到军事应以经济为基础，在军事思想上显然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他创办的这批民用工业，多数采取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形式，形成我国早期的官僚资本主义。尽管这批企业，未能使中国在经济和军事上真正富强起来，而且不同程度上与封建的政治、经济体制发生无法切断的联系，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此外由于它的垄断性，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有阻碍作用。但是，在“以土产敌洋货，力保中国商民之权利”方面，还是起了一定积极作用，特别是由于引进了先进的生产力（采用机器生产），又不能不刺激和推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3. 兴学育才

我们知道，李鸿章是一个从科举考试中严格训练出来的封建士大夫，维护以儒学为主体的封建传统文化的中心地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信条在他的心目中埋下

了较深的根基；然而随着时势的推移，尤其是对西方文化的逐渐了解和接触，对比中国落后受辱的严酷现实，李鸿章对八股取士制从怀疑发展到厌恶。而在当时，随着对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的举办，李鸿章认识到要把洋务运动推进到“富强相因”的阶段，就必须培养懂得西方先进技术的人才。但原有的科举制度已经适应不了这种需要，因而李鸿章认为必须积极地倡导改革科举，兴学育才。

早在 1863 年李鸿章就奏请在上海设立外国语言文字学馆。他在奏折中说：“我中华智巧聪明岂在西人之下，果有精熟西文，转相传习，一切轮船火器等巧技，当由渐通晓，于中国自强之道，似有俾助。”这一思想得到清政府赞许，于是李鸿章挑选上海近郡 14 岁以下儿童，聘西人教习外国语言文字。1869 年该馆移入江南制造局，改名为广方言馆。至光绪初年，广方言馆除培养了一批外语人才外，还在中国学者和外国传教士学者的合作下，翻译了西文书籍近百种，其中自然科学占 47 种，工艺军事类占 45 种，还有许多著作，如《实用化学入门》、《运规约指》等等。

为了培养技术人才，李鸿章于 1864 年即建议改革考试制度，提出了“专设一科取士”的思想。1874 年，他在《筹议海防折》中又将这种思想进一步充实与具体化。他明确指出，西方列强“以兵力威胁我们，几乎无一年间断”，而中国却缺乏懂得兵略、“精通洋法”的专门人才，原因就在于朝廷沿袭了以辞章取士而堵塞了士大夫趋向西学的途径。所以他恳请清政府“大力启开风气，破除拘谨而又缺乏活力的旧习气，求取制胜西方列强的实际技能”。要达到这一目的，最重要的问

题就是对科举制度进行变革。据此，李鸿章向清政府提出两点建议：一是在科举考试中，“另开洋务进取格”，来培养造就通晓西学的人才；二是凡有海防的省份，都应仿效西方设立“洋学局”，“分为格致、测算、舆图、火轮机器、兵法、枪炮、化学、电气学数门”，以来培养掌握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方面的“能人”，所学“如有成效”，使其“与正途出身没有差别”。但是，他的这两项具有远见卓识的建议不仅没有立即被清政府采纳，而且毫无例外地遭到了以廷官王家璧和于凌辰等人为首的极端守旧势力的一片斥责。他们认为李鸿章提出“学习洋人，极为可耻”。为此李鸿章勇敢地与他们进行了辩论，这场争论最后由总理衙门奕訢出面调解而平息，但李鸿章的建议未获批准。不得已，他只好在自己办的制造局中，附设一些技术学校或短期训练班，以培养技术人才，如江南制造总局附设机械学校。

从70年代末期开始，随着洋务运动的不断深入和对洋务人才需求的增多，李鸿章对科举改革问题的认识也逐渐有所提高。这表现在：第一，李鸿章从指斥小楷试帖进而抨击科举制度。1874年，李鸿章仅仅指斥小楷试帖，要求扩充洋学，而尚未抨击科举制度本身。1878年2月，他把批判的锋芒指向“时文”、“小楷”赖以生存的“科目”，揭示了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的弊端和朝廷倡导、士子迷恋“科目、时文、小楷”的危害。第二，李鸿章开始把“变科目”与“易官制”联系起来。60、70年代，李鸿章提出“变法”口号，主张遵循儒家传统治略，内修政事，并采用西法，举办洋务。到了80年代末期，李鸿章便把“易官制”提到“变法度”的首位。并

基于改革腐朽的官僚体制的需要而力图推进科举改革。当时，八股取士制度仍然支撑着腐朽的官僚体制，那些跻身显贵、醉心利禄的人，大都出身于科甲正途。从而，改革八股取士制度，创造“学贯中西”的人才，借以改变官僚队伍的基本成份，也就成为改革腐朽的官僚体制的先决条件和重要内容。李鸿章利用自己的学识、声望、地位和权力，尽可能地把扩充洋学作为整个洋务事业的一件大事来实行。

1880年、1885年，李鸿章基于培养新式军官、建设北洋海陆军的需要，奏准效法西方，建立天津水师学堂和武备学堂。天津水师学堂学习中学、西学、文事、武事；天津武备学堂学习天文、地舆、格致、测绘、算化、炮台营垒折法，并操习马队、步队及行军布阵分合攻守诸式，并兼习经史以充根底。这两个学堂为北洋海陆军培养了一批“文理通畅，博涉西学”的将佐。此外，李鸿章还效法西方相继设立了威海水师学堂、旅顺鱼雷学堂、天津电报学堂、天津西医学堂等等。当时李鸿章建立的各类学堂，同其他省份创办的学堂比较，不仅在数量和类别方面占有优势，而且其中许多还具有开创和示范意义。

李鸿章为了造就掌握科学文化知识的洋务人才，为了培养更多的技术人才，除了在国内推进科举改革、兴建新式学堂外，还力排众议，倡导派人出国留学。

设立“洋学局”培养了不少洋务人才，尤其是广方言馆之类专门化外语学校的创办，洋务特别是外交方面的人才愈益增多，但仍远远不能适应日益增多的错综复杂的洋务事业，更为重要的是广言馆或同文馆的学生长达8年才毕业，他们

只是从书本和课堂上对外国有所了解。一旦真正接触洋务方面的事情，往往笑话百出。于是，派遣学生到外国留学就成为一项当务之急的举措。首先提倡派人出国留学的是由一生致力于“西学东渐”的容闳，但集支持者、倡导者和主持者于一身的有远见卓识的人物却是李鸿章和曾国藩。

李鸿章办洋务，聘请了一些外国技术人员，试图让这些外国人作老师，让中国工匠跟着他们学习。但在实践中，李鸿章慢慢发现“洋人往往不肯把奥秘传给中国人”。他还发现，以往所请的“洋专家”，“高低不等”，有的人对“所使用的机器，不明其原理”，只不过是一些滥竽充数的庸人。鉴于此，李鸿章认为“选派留学生，培养人材，实在是中国自强的根本”。“中国选募学生留洋，学习西方以图自强，实在是当务之急”。

早在 1871 年，李鸿章就会同曾国藩奏请清廷批准，于 1872 年 7 月，选派中国第一批幼童赴美学习。这是中国选派留学生的开始，也标志着李鸿章、曾国藩、丁日昌、容闳等有识之士的愿望终于实现了，用李鸿章的话说，这件事“固然属于中华创始之举，并且也是古来所没有过的事情”。1873 年 6 月，第二批幼童由黄胜率领赴美；同行的有 7 名自费留学生。1874 年 9 月，第三批幼童由祁光熙率领出国；1875 年 10 月，第四批幼童由邝其照率领前往美国，同行的有 3 名自费留学生。至此，120 名幼童在李鸿章等人的支持下、主持下，按计划全部派往美国留学。其中学习出色者有詹天佑、唐绍仪、梁敦彦等人。

1876 年，李鸿章又派遣淮军中下级军官卞长胜等 7 人，

随同洋教习赴德国学习陆军。1887年初，李鸿章又会同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楨联衔奏准，选派福建船政局前后学堂学生26名、艺徒4名，赴英、法两国学习制造、驾驶。同年，第一批赴欧学生出国。在法国学习制造的学生，多分赴各矿厂学习开采及冶炼、冶铸工艺诸法，均得有文凭，学成后并游历英法比德各国新式机器船械各厂。赴英学习驾驶的学生，先入格林尼次官校，后陆续调入铁甲船学习，历赴地中海、大西洋、美利坚、非洲、印度洋等处操练排布迎拒之方法。离船后又专请教习补授电气、枪炮、水雷各法，均领有船长文凭。在这批留欧学生中，学习制造出色者有魏瀚、陈兆翱等，学习驾驶出色者有刘步蟾、林泰曾等。1888年，李鸿章鉴于学习制造的学生，原定学制3年为期太仓促，“所学不全”，建议改为6年；学习驾驶的学生，每年仅有两个月在大兵船上实习，“阅历亦浅”，建议每年改为6个月在船上实习，以增加阅历，但原定学制3年不改。

李鸿章等人所倡导的出国留学之事在当时中国文化思想氛围下并非一帆风顺，整个过程都充满了阻力。封建卫道士们把出国留学之事看做是大逆不道。于是千方百计地加以破坏。最后，出国留学事业被人为地夭折了。但是树被砍，果实犹在，所有这些曾出国留学而返回的人都掌握了较为先进的知识和技能，无论是从事教育和外交工作，还是在工商企业方面，中国留学生都起了巨大作用。这些留学生凭着强烈的爱国热情，为祖国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从此之后，中国留学外国的风气大开，尽管困难重重，但却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产生了一批像严复那样的启蒙思想大师和辜鸿铭

那样的洋务人才、著名学者。

李鸿章根据洋务事业的需要，积极主张和大力赞助中国留学事业，说明他与顽固守旧论者不同，能够因时而变，敢于突破中国传统文化的藩篱；不像顽固守旧论者那样迂陋拘虚，冥顽愚昧，说出“以忠信为甲冑，以礼义为干櫓”那样荒唐可笑的话，做出见洋人“掩面以避之”那样供西方人茶余饭后引以为笑的事来。这是中国近代中西文化相互碰撞、交融、吸收以及中国近代文化复杂多变这个基本特征在李鸿章等有识之士身上的反映。

4. 筹办海防与组建北洋海军

（一）筹办海防

海防问题是近代中国面对资本主义列强的挑战而提出的重要课题，建立海军，加强海防建设，这是 70 年代以后李鸿章积极引进西方先进技术，以实现军事“自强”的一项重要内容。

鸦片战争改变了历代边防多在祖国西北的状况，东南沿海疆域成为近代国防第一线，原来那种“华洋隔绝天下”的局势，一变而为“中外联疆之天下”，从而使海防问题有了新的内容和意义，防御对象由历史上的少数民族以及如明代那样散股的倭寇和海盗，变为了日益向外扩展殖民市场、力图按照预定的设想称霸世界的资本主义列强。与此同时，海防问题不再是只涉及东南沿海安全的局部性问题，而成为一个关系国家独立地位和中华民族发展前途的全局性问题。海防

建设也不再是增加旧式“风篷”和“孤矢”，而是中国向西方学习“长技”，实现“自立”、“自强”目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李鸿章筹办海防之前，曾出现了海防与塞防之争。1874年春，日本派兵3000人，突然在台湾南部登陆。清政府因海防空虚，不敢抵抗，只好接受西方列强的“调停”，赔银50万两以换取日本撤兵。这一可耻的妥协，引起全国上下对海防的关注，一时要求加强海防的呼声迭起。主持总理衙门事务的恭亲王奕訢，提出“紧急机宜”六条，主要内容仍不外是设厂造船，购买新式武器和建立海军等等。原任江苏巡抚丁日昌还提出一个《拟海洋水师章程》入奏。与此同时，我国西北边疆发生危机，由于英、俄两国加紧对新疆的侵略，左宗棠于镇压陕甘回民起义之后，正准备率大军入疆，收复失地。海防与塞防同时吃紧，究竟应采取何种对策？从而有了一场海防与塞防之争。在这场争论中，李鸿章从“筹饷”和“中国目前力量”出发，反对用兵新疆，主张“暂弃关外”，专顾海防；左宗棠则主张海防与塞防二者并重。最后，清廷采纳了左宗棠的意见。1875年5月3日，命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速筹进兵。30日，命李鸿章和沈葆楨分别督办南北洋海防事宜，并决定每年从海关和厘金内提取400万两作为海防经费。

李鸿章筹办海防，他的海防战略设想包括：着重沿海陆防。他认为：“敌从海道内犯，自须丞练水师。惟各国皆系岛夷，以水为家，船炮精练已久，非中国水师所能骤及。中土陆多于水，仍以陆军为立国根基。若陆军训练得力，敌兵登

岸后，尚可作战。炮台布置得法，敌船进口时，尚可拒守。”为使陆防可恃，李鸿章认为：首先沿海各防营，必须抛弃弓箭、刀矛，而一律改用最新式的后膛枪炮；其次各海口，要仿照洋式修筑沙土炮台”，所用炮位，“务在及远，愈远愈妙；务在能中，不中不发”；第三，守口营兵，不必多，但必须以坚守炮台为主。李鸿章重视陆防，但他并不是旧式的陆岸守口主义者。他认为，如果仅凭陆防而无海军，那敌船可以到处停看，而我们只能望洋而叹；但如果我们有海军，则可以“化呆着为活着”，防止敌军沿海登岸。因此，李鸿章主张沿海设防，兼顾陆海两方面防务，才是“强兵之要务，立国之根基”。此外，李鸿章的海战略设想，并不仅限于“自守口岸”，还须“拓远岛为藩篱，化门户为堂奥”，以扩大对外海的纵深防御。为了扩大对外海的纵深防御，他主张采取“以战为防”的攻势防御思想，这较两次鸦片战争期间以岸防为主，以守为战的防御思想，显然在海防战略思想上是一个重大的进步。

以上是李鸿章筹办海防的战略设想。依照这样的设想，他先于北洋各口陆续添置海口炮台和后路炮台，自制或购买西式大炮分列于上，派淮军分别驻守，并于紧要口岸附近之处，屯扎大支劲旅，无事时集中训练，有事时专备游击。与此同时，他积极展开筹建海军的工作。

（二）组建北洋海军

在李鸿章筹办海防之前，清朝没有近代化的海军，只有旧式外海水师，用于“缉捕海盗”，不能临于大敌。1862年，清政府为了镇压太平军，曾派总税务司李泰国到英国买船组

织舰队，但买回的这支所谓“阿思本舰队”开到中国后，李泰国、阿思本妄图把它控制在英国侵略者手中，清政府只好令其驶回英国变卖。此后，清政府即转向设厂造船来兴办海军。截至 1874 年为止，计福建船政局造成轮船 15 号，江南制造局造成轮船 5 号，加上从国外购买的 10 只，共 30 艘轮船。但这些船只吨位很小，装备陈旧，只能用于沿海巡缉，根本无法抵御外国的海上侵略。所以，清政府决心要建立一支近代化的海军，但实际采取行动是从李鸿章筹办海防时开始的。

1874 年，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中，对筹建海军提出四项建议：一是以购船为主建军。在海防危机之前，李鸿章亦主张设厂造船兴办海军，但到海防危机发生时，他改变主张，建议清政府变换方针，说“中国造船之银倍于外洋购船之价，今急欲成军，须在外国定造为省便”。此项建议，李鸿章虽出于当时形势所迫，但对此后中国造船工业的发展带来了不良影响；二是强调购置铁甲大兵船。他针对丁日昌在《拟海洋水师章程》中提出成立北洋、东洋、南洋三支海军的建议，除了同意丁日昌三洋兵船“合共四十八艘”的意见外，鉴于日本所以敢于发动侵台战争，惟恃有铁甲船为自雄之具，力主“北、东、南三洋各有铁甲大船二号”，并根据中国已造成 20 号兵船，可抵一艘兵船之用。强调应先购铁甲，“有余力再置他船”；三是各要口须添设一二艘水炮台船，即小型炮舰。四是裁撤各省旧有水师之红单、舢板、艇船。1875 年，清政府在《著李鸿章、沈葆楨分别督办南北洋海防谕》中，除了对第四项建议未予考虑外，基本上同意了李鸿章所提的另

外三条建议。虽然清政府筹办三洋海军的方针已定，但限于财力，工作无法齐头并进，只能有所侧重，于是在 1875 年 5 月决定“先于北洋创设水师一军，俟力渐充，由一化三”。并请“简派分段督办海防事务大臣两员，专理其事”。1875 年 5 月 30 日，光绪皇帝发布上谕，正式任命李鸿章、沈葆楨二人分别督办北洋、南洋海防事宜。从此李鸿章正式开始了创建北洋海军的征程。

李鸿章创建中国第一支近代海军，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第一：建立和完善海防和海军行政机制。

由于清廷任命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事宜，并决定“先就北洋创设水师一军”，所以李鸿章及其北洋海军在清朝的海防、海军建设中一开始就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1879 年，沈葆楨去世，从此“海军之规划”也就专属于李鸿章，乃设水师营务处于天津，办理海军事务，以道员马建忠负责日常工作。1881 年 9 月、10 月，由英国订造的镇中、镇边两艘炮舰以及超勇、扬威两艘巡洋舰也先后驶回。这样，北洋海军加上原有的练船、运输等船，已拥有 14 艘船只，初具规模了。于是李鸿章奏请以提督丁汝昌统领北洋海军，奏改三角形国旗为长方形，以纵 3 尺横 4 尺为定制。1885 年，由于中法战败的教训，清政府一面处分战守不力的官员，一面大力扩充海军。清廷在谕旨中宣称：“当此事定之时，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因福建海军在战争中已经覆没，南洋海军也受到一定的损失，清政府要“大治水师”，就当时的财力而言，只能是使在战争中未受任何伤害的北洋海军尽快成军，这当

然是李鸿章所期望的。所以，他立即表示赞同，并誉之为“洵为救时急务”。李鸿章趁此机会，针对海防、海军建设缺乏统一领导和统一指挥而导致的诸多弊端，建议效法西方，添设海军部或海防衙门机构，以专责成。他在一篇奏折中反复陈说：“西方国家设立水师，无不统归于海部，即使东方的日本也另设海军大臣加以管理。中国海防虽分为南北两洋，而各省另有督抚大臣，迁调无常，意见或异，自开办水师以来，最终无一定准则，听任各省督抚任意变更，操法号令参差不齐，终无实际效果”。他反复提醒清廷，如果再不改弦更张，听凭那些滥竽充数者任意把持，水师乃有名无实，恐怕永无振兴之日了。李鸿章以实行集中统一领导为由，添设海军部或海防衙门的建议，既对中国近代海防和海军建设大有益处，也迎合了清政府控制海军大权的意愿。因为这时清政府已决定收回海军统一管辖之权。1885年10月，清政府正式决定设立海军衙门，由淳亲王奕譞任总理，庆郡王奕劻和李鸿章为会办，但实际大权却掌握在李鸿章手中。从此，李鸿章凭借海军衙门这一统一机构，以整顿海防为目的，加快了建设北洋海军的步伐。1888年夏天，李鸿章把入京陛见的直隶按察使周馥留在海军衙门具体商议水师章程问题，1888年9月，海军衙门正式奏定《北洋海军章程》。章程明确规定，设海军提督一员，统领全军，提督衙门设在威海刘公岛上。设总兵两员，分为左右两翼。副将以下各官兵，根据他们所带舰艇的大小，职务的轻重，按照品级分别予以安置。总兵以下的官员，都住在舰上，不另设衙门。1888年12月，清政府命令丁汝昌为北洋海军提督，刘泰曾为左翼总兵，刘步蟾为右翼

总兵。至此，北洋海军建制正式形成。

第二，购买和自造船舰。

海防建设的重点在海军，海军的核心则是舰队。初建海防时，李鸿章主张自造船舰，不向外国购买。但在边防危急、仓促建立海军的情形下，他转而采取买船为主、造船为辅的方针，他购买船舰的理由是：“中国造船之银，倍于外洋购船之价。今急着想要成军，必须在外国定造为省便。但不可能托洋商误买旧船。”定造之时，选举学生、工匠一同前去，由经办人员亲赴各厂考察何种船只最好，且适宜于中国水道，再“与其议价定造”。在建设过程中，亦由专员检查督造，凡不合规格者要重新返工。从此以后，李鸿章开始向英国、德国订购各种舰艇。1875年，李鸿章向英国订购4艘“新式”炮船，又称为“蚊子船”，这4艘船于1876年间先后驶到中国，被分别命名为“龙骧”、“虎威”、“飞霆”、“策电”；1878年又订购了4艘蚊子船，被分别命名为“镇东”、“镇西”、“镇南”、“镇北”，这四艘被拨给北洋海军，先前买的四艘调拨给南洋。后来经实践证明，这种蚊子船都是钢片做成的，几乎成为一堆废品。对于购买铁甲船，由于花费极高，起初未试办。1879年日本武力吞并琉球，使李鸿章认识到“今要整备海防，力图自强，非有铁甲船数只，方足以控制重洋”。于是，他在1880年向德国订造两艘铁甲船。这两艘铁甲船于1885年抵达中国，由李鸿章命名为“定远”和“镇远”，这是北洋海军中吨位最大的船只。1883年，李鸿章否认购买英国所造的“新式加大碰快船”，而购买了德国所造穹面钢甲巡洋舰，命名为“济远”。1884年，又从德国购进两艘巡洋舰，分别命

名为“经远”、“来远”。与此同时，还从英国订购了“致远”和“靖远”两舰。李鸿章在向英、德两国购买船舰的同时，还将上海、福建两地造船厂制造的一些轮船调运到北洋，编入北洋海军，先后有巡洋舰“平远”，“广甲”，鱼雷巡洋舰“广乙”、“广丙”，练船“康济”、“威远”、“海镜”以及通报、运输船各两只。至1888年，北洋海军已拥有一支可观的大型舰队。有巨型铁甲舰两艘，高速巡洋舰7艘，炮船6艘，鱼雷艇6艘，练船3艘，运输船1艘，共计大小25艘。至此，北洋海军从建制到船舰数量初具规模。

第三，创建海军基地。

要创建近代化海军，除了船舰以外，还必须有相应的屯泊船舰的港口，检修船舰的船坞以及与之配套的炮台。因此，李鸿章在筹组舰队的同时，对海军基地的基址进行了多次勘察，最后选定了旅顺和威海卫。他说：“综览北洋海岸，水师扼要之所，惟旅顺口、威海卫两处，进可以战，退可以守。”因威海卫工巨费繁，李鸿章决定先经营旅顺口，于此建设船坞及海岸炮台，作为战舰收宿之地，并兼蔽奉省和保卫京都。1880年，旅顺基地工程开始动工，先在海岸修筑炮台，同时疏浚口门、船澳，以浚深海港。至1886年建成东西炮台9座，安置大小炮位48门。后又增修炮台4座，添置炮位23门。从1889年开始，又环绕旅顺背后，建造陆路炮台17座，安置炮位78门。与此同时，为巩固旅顺后路，兼防金州，又在大连湾修筑海岸炮台5座，陆路炮台1座，安置炮位24门。在此期间，李鸿章因旅顺船坞工程进度缓慢，于1887年包给法商承办，至1890年11月全部竣工，耗银131万两。旅顺船坞

是一项巨大工程，当时被誉为海军的根本。就整个旅顺海防工程来说，在当时亦堪称为配套完善的远东一流的近代海军基地。威海卫工程于 1887 年才开始全面展开，因起步较晚，设计建造更具有近代化、大型化的特点。到 1890 年建成北帮炮台 3 座，南帮炮台 3 座，刘公岛炮台 6 座，日岛炮台 1 座。从 1891 年开始，又修筑威海后路炮台 4 座。整个威海卫炮台群，共配置大小炮位 127 门，各炮台建造极为庞大、坚固，既配备有大口径岸炮，又有各种分隔的弹药舱和炮弹提升装置。在刘公岛、日岛，还分别建造了地阱炮。各炮台配置较为合理，彼此互相依托，交叉火力，连绵相接，形成严密的防御体系。威海卫除炮台工程外，其他如海军公所，大铁码头、船坞等，也都是规模浩大的工程。威海卫宏大的海防工程陆续建成，人们认为从此威海卫可以成为名副其实的“东海屏障”。

旅顺、威海基地相继建成，威海卫即为北洋舰队的永久驻泊地，旅顺则为北洋舰队维修保养之所，两地各设提督衙门，均为北洋海军重地。就防御体系来看，威海、旅顺恰似人之双臂，环抱渤海，形成对京都的钳形防御网，成为渤海之“锁钥”，天津之“门户”。

第四，培育和训练海军人才。

李鸿章在实践中认识到，要建立一支近代化海军，除了船舰、基地等物质条件之外，关键问题还需有训练有素的人才，“水师为海防急务，人才为水师根本”。基于这个认识，李鸿章在创建北洋海军过程中，一面购买、制造船舰，一面大力培养、训练人才。为此，李鸿章继续派遣留学生赴国外培

训，同时在国内创办了一系列军事学堂，大力培养海军专门化人才。1880年创办天津水师学堂，以留学回国的严复为总教习，并聘任洋员授专业课。1882年，将天津水雷电报学堂改组为水师管轮学堂，天津水师学堂的规模更为完备。1885年创办天津武备学堂，以培养能通晓西法的淮军中下级军官。1890年，为便于学生就近学习驾驶、鱼雷、水雷、枪炮等技术，又在刘公岛创办了一所威海水师学堂。此外，为了培养急需的水雷、驾驶、管轮、枪炮等专门人才，还先后创办了大沽水留学堂、旅顺鱼雷驾驶学堂、管人才学堂、管轮学堂、水雷学堂、威海枪炮学堂等等。所有这些学堂，不仅为海陆军培养了一批相当的军事技术人才，而且促使了西学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

李鸿章除了积极培养、选任中国国内人材外，还雇佣了一批洋人来担任技术指导。李鸿章认为，海军初创时，国内无人通晓，而“外侮日迫，急图借材异国，迅速集事，实有不得已苦衷”。虽雇用洋人，但李鸿章对聘请洋人规定了基本原则：“一切调度事宜，权力由中国军官掌握，外国人仅充当‘顾问’。”

李鸿章创办海军学堂只是提供一种基本训练，他坚持派遣海军学员出国留学，尤其是与航海有关的技术。从1877年至1890年，共有3批35名海军学员派送英国。有的送格林尼茨皇家海军学院，有的送乌理治皇家炮术学校，其他派往英国海军实习。这些学生归国后在北洋海军中居于高级地位，并被委以重任，刘步蟾和林泰曾佼佼者。

以上所述即为李鸿章创建北洋海军所做的工作。总之在

李鸿章的努力下，北洋海军自 1875 年筹划，1888 年正式成军，标志着中国近代第一次海军的建成，具有重要历史意义。作为西方国家海上力量勃兴的反应，尤其作为日本威胁日增刺激的结果，中国决定建设海军，李鸿章恰是适逢其会，适充其任，肩负起这一历史性责任。他的功绩是不能抹杀的。近代海军是 19 世纪的一个革新事业。海军的发展要求有复杂精致的装备和高度专业化的科学技术知识。考虑到有些方面——工业、科学和技术、人才、财政的现状，中国当时完全不具备条件以支持一支近代海军。北洋海军的诞生，几乎全靠李鸿章一人独自努力，当时他面临着向清政府寻求资金，说服各省官员给予合作，同时又要抵挡来自各方的不断批评，困难可想而知。但他克服种种困难，以 10 年持续不断的努力，造就了一支拥有 30 艘战舰、120 门大炮和 4000 名官兵的舰队，它至少在数量上超过了日本的海军力量。基于这些，我们不应以北洋舰队在甲午战争中全军覆没而否认李鸿章在中国海防事业上所做的贡献。

5. 北洋海军的覆灭与洋务运动的破产

（一）中日甲午战争爆发

日本是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带有浓厚的封建性和侵略性。继 1874 年发动侵台战争之后，于 1879 年又强占了琉球。1889 年策动朝鲜“甲申政变”。1885 年，日本制定了 10 年扩军计划。这一计划于 1892 年完成，1893 年成立战时大本营，这样日本做好了武力吞并朝鲜并进而同中国作战的一切

准备。

1894年3月，朝鲜南部爆发了“东学党”起义，朝鲜统治者极为恐慌，请中国出兵助剿起义军。日本政府认为这是发动侵略战争的好机会。为了诱使清政府出兵干涉，以制造侵略借口，便通过日本驻朝使馆翻译官郑永邦向袁世凯表示：“如果清朝出兵平息朝鲜内乱，日本一定不会干涉。”这使得袁世凯坚信日本不会派兵干涉，从而一再致电李鸿章迅速派兵援朝。6月4日，李鸿章又接到朝鲜政府关于“酌派数队，速来代剿”的请求。于是李鸿章决定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统兵1600人进驻朝鲜汉城以南的牙山，会同朝鲜政府镇压“东学党”起义，并按照1885年中日协定由驻日公使汪凤藻通知日本关于中国出兵朝鲜的消息。日本的政府见清政府已出兵，便以“保护”日本使馆和侨民为名，命第五师团大举进入朝鲜，并于6月10日占领了汉城。袁世凯针对日本同时派兵入朝的异常情况，电告李鸿章拿主意。这时李鸿章也看不出日本侵略的最终目的，寄希望于外交上解决，一厢情愿地避战求和，在军事上防备考虑不充分。朝鲜“东学党”起义被镇压后，李鸿章以“韩乱”已经平息，向日本提出中日同时撤兵。日本非但不允许，反而继续增兵，一月之内派到朝鲜的军队达万余人，企图发动侵略战争的阴谋已昭然若揭。李鸿章知日本居心叵测，只好一面电告中国驻朝军队：“日内外俱备，我备未齐，不宜先露心机。”一面紧张地进行外交活动，幻想西方列强尤其是英、俄等国出面调停，促使日本撤兵。日本则以默许英、俄等国的在华利益为条件，换取了列强各国在中日两国冲突中，采取有利于日本

的“中立”立场。李鸿章的外交活动宣告失败。

中日军队在朝鲜对峙，战争一触即发。7月12日，叶志超致电李鸿章请示是进还是退，并提出了上中下三个对策：上策为增加军队，准备同日本作战；中策为自动撤兵，下策为坐守绝地。同时，李鸿章上奏朝廷，建议采取叶志超的中策，撤后，行文各国公使并日廷，申前次同撤之约，如彼不依，秋初再图大举。但“亲政”不久的年轻皇帝光绪力图有所作为，不同意李鸿章的建议，决定采取叶志超的上策，援兵朝鲜同日本作战。并于7月14日下谕令：“现在事机紧迫，著李鸿章速为筹备，先派一军由陆路前往边境驻扎，以待出发。”李鸿章奉旨后，十分犹豫，电请养病在家的刘铭传“督办朝鲜军务”，刘铭传托病不出。此时光绪帝对李鸿章的迟疑态度极为恼火，于7月16日又下了一道严谕：“责令李鸿章不可畏缩不出派，否则如果耽误战机，定治罪于他。”李鸿章受到严斥，被迫无奈只好匆忙着手部署，分别由天津、旅顺、奉天等地抽调总兵卫汝贵、左宝贵、记名提督马玉昆、副都统丰升阿等军14000余人，取道辽东过鸭绿江进军朝鲜平壤，另由天津抽调仁军、北塘兵2000余人，取海道进援牙山，并派北洋舰队的济远、广乙、威远3舰护航。7月25日，日本联合舰队在丰岛海面偷袭中国护航的海军船只，并击沉运兵船高升号，不宣而战。28日夜，日本陆军又偷袭牙山清军，在成欢接仗，清军大败。8月1日，光绪皇帝正式颁布宣战上谕，甲午中日战争于是全面爆发。

（二）消极防御

从中日战争总体看，日本精心策划，采取战略进攻态度，

相反地，清政府是被迫应战，事前缺乏充分准备，事后也没有制定合乎实际的战略计划，完全处于战略防御地位。这决定了清政府以后所采取的一系列方针以及北洋海军逐步走向全军覆没的结果。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制定、实施“保船制敌”方针，平壤战役大败。早在中日宣战之前，日本战时大本营就已经制定好入侵中国的战略方针：以主力在渤海湾登陆，于直隶平原同清军主力决战，夺取北京。而在清军方面，事先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战略方针，直到正式宣战，清政府才在宣战诏书中，提出一个海守陆攻的战略方针：“著李鸿章严饬派出各军，迅速进剿，厚集雄师，继续进发，以拯韩民于涂炭，并著沿江、沿海各将军，督抚及统兵大臣，整饬戎行，遇有倭人轮船驶入各口，即行迎头痛击，悉数歼除。”根据这一方针，清政府决定再增调陆军赴朝，先在平壤集中，然后南下驱逐入朝日军，以海军各舰队分守各自防区内的海口，北洋舰队即游弋于黄海北部，扼守渤海海峡，策应入朝清军，并确保京都门户的安全。

不久，日军得知大批清军将于平壤集中南下，决定命第三师团赴朝，与第五师团合编为第一军，北攻平壤，先占领朝鲜全境，作为进攻中国的桥头堡。命联合舰队“从海上接应陆军，使其完成进击平壤之功”。根据这一部署，日本联合舰队放弃同北洋舰队决战，改用牵制北洋舰队的办法，控制仁川、大同北口，阻止清军从海道增援朝鲜，以策应日本陆军北攻平壤。

丰岛海战之前，李鸿章十分重视控制仁川、大同江口，但丰岛海战后，李鸿章慑于日本舰队的威力，不仅主动命丁汝

昌将舰船撤回，而且每当丁汝昌率舰队往巡，总告诫他，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以保全船为主。中日双方正式宣战后，李鸿章既害怕舰队远出有失，又怕敌军舰队突然闯入北洋各口。1894年，8月9日，丁汝昌奉命率10舰赴朝鲜海面巡击，但日本联合舰队不与他作战，而是驶进威海、旅顺港口，假装要攻击，实际目的是要北洋舰队回航，把制海权让给他们。而此时，光绪皇帝获悉日本舰队深入威海、旅顺一带活动之后，担心他们会入侵大沽口，于是于8月23日电谕丁汝昌，要他在大沽门户附近巡航，不得远巡。这样，拱手将仁川、大同江口的制海权让给了日本。

因丁汝昌受李鸿章“保全坚船”的束缚，多次出巡无功，引起朝野不满，光绪皇帝于8月26日将其革职，为此，李鸿章上奏为丁汝昌辩护，并乘机正式提出“保船制敌”的作战方针。从此以后，“保船制敌”就成为北洋海军对敌作战的基本方针。按照这一方针，主动放弃与日本海军争夺黄海制海权，而退守“北洋各口”，不出渤海一步。这使日军得以从海上顺利地应援侵朝陆军。1894年9月15日，日军对平壤发动总攻，当夜攻占平壤。19日，李鸿章电告叶志超驻守义州，三天后，又令其全线撤回，退出鸭绿江，日军随即占领了朝鲜全境。

② 黄海海战与旅大陷落。

在平壤战役前夕，李鸿章为了及时增援平壤，决定将驻防大连一带的总兵刘盛休所部铭军8营4000人，由海道运至大东沟，然后转由陆路开赴朝鲜，并命丁汝昌率北洋舰队护航。1894年9月16日，北洋水师11舰护送增援平壤守军开

抵鸭路江口大东沟登陆。17日上午这批舰船准备返航时，悬挂着美国国旗的12艘日军舰船突然换为日本国旗，袭击北洋水师舰船，丁汝昌仓促应战，布阵零乱，指挥无方，双方激战5个小时之后，被日军击沉5舰，另外有6舰负伤，死伤官兵千余人；而日军旗舰松岛号等5舰受重创，死伤舰长以下官兵600余人，日舰首先撤离战场，北洋水师也返回旅顺。至此黄海大战结束。

这次黄海大战，是中日双方海军的一次主力决战，规模大，战斗激烈，时间长，在战斗中，北洋舰队虽损失大于日方，但也给日舰以重创，使日军要“聚歼清舰于黄海中”的狂妄计划未得逞。但是客观上讲，黄海大战中双方海军就实力而言，中国并不逊于日本。北洋水师如果准备充分，指挥有方，不致于损失那么重。即使如此，日本是长线作战，经费及武器供给和天时、地利、人和诸多因素均不利，如果黄海大战后，北洋舰队积极调整战略部署，有可能挽回不利战局。可惜的是，李鸿章进一步陷入畏惧妥协之境地，积极寻求西方列强出面调停，想尽快结束战争。此外，由于李鸿章视北洋舰队为私人资本，对于这次海战损船较多，他大为愤怒，再次强调“保船”方针，使得丁汝昌不敢再战，致使日本海军基本上掌握了黄海制海权，对以后战争进程及北洋舰队的全军覆没产生了重大影响。

黄海海战后，日军战时大本营为了首先实施侵入辽东半岛的作战计划，令第一军尽快打过鸭绿江，入侵辽宁，威胁沈阳，以牵制正面清军，并掩护由第一师团和第十二混成旅组成的第二军于辽东半岛进行登陆作战；而清军方面，为了

阻止日军向中国本土进攻，已由海守陆攻转变为全面防御。针对当时敌我态势，李鸿章提出了所谓的“单纯防御作战”方针。而光绪皇帝，虽抱负很大，但他既动员不了全国力量，又受到慈禧的牵制，难有所作为，因此，清政府采取了李鸿章提出的单纯防御作战方针。但即使采取这一方针，由于未弄清楚日军主攻方向，对敌人重点进攻的辽东半岛非未加强防御力量，反而不断把守军调赴他处，这就给日军在这里登陆提供了有利条件。1894年10月24日，日军第一军首先在鸭绿江发起进攻。同一天，第二军在日本海军护航下，没有受到北洋舰队的任何阻拦，也开始顺利地花园口登陆。10月底，当登陆日军缓慢向前推进之际，丁汝昌率舰队由威海抵达旅顺，但未敢前往日军登陆地点进行任何必要的袭击。11月7日，登陆日军因驻守大连清军溃逃而不费一枪一弹便占领了大连湾。同一天，丁汝昌也率舰队返回威海。后由于受到李鸿章训斥，11月12日下午，率舰队开赴旅顺，稍事游弋，于13日晚即离开旅顺折回威海。22日，旅顺即被日军攻占。此后不到一个月，日军即攻占了辽东半岛大部分要地，为进行直隶平原决战，夺取了前进阵地。

（3）威海卫失守与北洋海军覆没

日军在攻占旅大之后，准备进行威海卫战役，但由于威海卫军港正面设防十分坚固，不易攻取，于是决定选择清军防御薄弱的荣成湾一带登陆，从侧后夺取威海卫。而清军方面，因辽东半岛溃败，清廷责怪李鸿章救援不力，下诏将其革职留任，命他亲赴大沽、北塘等处巡视、布置。同时，把兵力多调到辽沈，而忽视山东半岛。结果，京都多达200余

营，近 10 万人，而敌人进攻重点山东半岛仅 40 多个营，不到 2 万人。特别是荣成方向，兵力最弱，仅 4 营 1400 多人。鉴于威海卫后路兵力单薄，守将戴宗骞曾经向李鸿章建议采取“虽布近局、仍扼外险，宁力战图存，勿坐以待困”的战守之策，但李鸿章仍坚持采取单纯防御方针，使得陆岸守军只好坐等敌人来攻，海军舰只则被降为要塞的活动炮台或辅助炮台，完全失去了舰队所具有的机动性能，为日军全歼北洋舰队提供了条件。

1894 年 1 月 20 日，日军 2 万多人在成山角登陆，防守荣成的 4 营清军一触即溃。1 月 30 日，登陆日军从威海卫侧后会同威海卫口外的日本海军攻打南帮炮台，守将刘超佩畏敌败逃，士兵各自为战，最后仅剩七八百人突出重围，南帮炮台被日军占领。同时北帮炮台守军一哄而散。丁汝昌急命舰队将北帮炮台轰毁，以免资敌。2 月 1 日，日军进占北帮炮台，威海卫守将戴宗骞退至刘公岛自杀，威海陆上据点尽失。日军陆军既占据了南帮炮台，便用炮台大炮对停泊在港内的北洋舰队终日轰击，日本海军则在口外实行封锁，北洋舰队和刘公岛已经陷入敌人的重围之中。2 月 5 日，6 日，日本海军鱼雷艇趁夜里偷入东口，定远、来远、宝筏等舰相继被攻毁。7 日，北洋 12 艘鱼雷艇遭日舰追击，全部被俘。这时的刘公岛电讯已断。在北洋舰队服务的洋员马格禄、浩威之流，趁机唆使清军部分民族败类公开要求投降。9 日，靖远舰又被日军击沉，刘步蟾自杀。10 日，丁汝昌下令沉船，由于洋员的反对，无人执行他的命令。11 日，丁汝昌得知陆军已无法援助，召集众将领开会，研究突围，但各将领反抗命令，自行

散去，并逼迫丁汝昌投降，丁汝昌服毒自杀。12日，洋员浩威假托丁汝昌的名义起草降书，送交日军统帅部请求投降。北洋舰队尚存的10艘舰船和刘公岛各炮台军资器械，全部为日军所掳。至此，李鸿章经营十多年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了。此时李鸿章也结束了权倾朝野的日子，不仅朝廷对他不再宠信，在文武百官以至百姓中，他也威信一落千丈。甲午战争，北洋海军的全军覆没，是李鸿章大搞洋务的终点。

北洋海军自1875年开始筹建，1888年正式成军，它不幸在第一次中日战争中为日本海军完全摧毁，李鸿章的努力付之东流，同时也使中国丧失了制海权。北洋舰队的毁灭，可以部分归咎于清政府、李鸿章所采取的消极防御战略，但北洋海军的本身存在的若干缺点也不容忽视。首先制度上含混不清。北洋海军名义上隶属于北京海军衙门，但实际上却归李鸿章节制。李鸿章此时已成为全国督抚的领袖，集内政、外交、洋务、海防于一身。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他忙于应付每日遇到的政治问题，以致不能对北洋海军诸多问题给予更多注意；其次，指挥系统不清。由于李鸿章未能经常顾及，北洋海军由丁汝昌负责。丁汝昌未受过海军正规训练。因此他常为部下所轻，他们大多数人是由中国水师学堂毕业。另外北洋舰队中的外籍军官有的傲慢自负，要求过分。这些外国军官和中国军官之间关系紧张，时有冲突发生，它导致北洋海军进一步衰败和腐化。第三，经费不足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最初海防经费预算每年200万两，但从未如数收齐。北洋海军改隶于海军衙门以后，舰队每年预算减至不及130万两。最糟的是1891年4月，户部建议停购舰上大炮、裁减海

军人员。这些建议得到朝廷准许。这使舰队及其装备的更新成为不可能。以上北洋海军自身所存在的弱点以及甲午中日战争中李鸿章一贯主张“防御”的方针导致了北洋舰队在中日甲午战争中被日军全部歼灭。

6. “洋务运动”评析

李鸿章作为近代洋务派首领之一，他所倡导的洋务运动历经 30 多年，以北洋舰队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全军覆灭而宣告结束。对李鸿章所倡导的“洋务运动”应如何看待呢？有人以洋务运动有借西方先进枪炮、船舰镇压农民起义的一面和洋务运动最终成效不大乃至失败而否定它；也有人因李鸿章负责签订了许许多多的不平等条约、误国丧权而抹杀他所倡导的“洋务运动”的进步的、积极的一面。这些评价李鸿章倡导的“洋务运动”的观点都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看待事物应坚持两点论的观点，既不包庇其缺点，也不应抹杀其优点。因此对于李鸿章所倡导的“洋务运动”我们应持全面的、两点论的观点。

首先，开展“洋务运动”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1840 年爆发的鸦片战争，是东方古老刀矛与西方近代炮舰的拼杀，是落后农业帝国与新兴工业王国的较量。鸦片战争中国的失败和城下求和的耻辱，极大地震撼了中国人的心灵，促使一部分爱国志士仁人开始突破愚昧无知的心理氛围，从反省的角度，用新的眼光看世界，从中西文化差距的对比中，去寻求救国救民的自强御侮之策。林则徐、魏源率先提出了“师

夷长技以制夷”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观点。但这一进步观点很快就被扼杀在中国几千年的儒家文化体系中。李鸿章这个封建儒家文化体系下造就出来的士大夫，背负着几千年中国传统文化的沉重包袱，站在时代前列，勇敢地接受了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主动地借助西法以自强求富，明智地做出了选择资本主义近代化这条关系到近代中国生死存亡的道路，搞起了洋务运动。所以：尽管镇压中国农民起义是李鸿章倡导“洋务运动”的一个客观原因，但它也是由当时中国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背景等客观历史环境和条件所决定的。

其次，我们从洋务运动的实践效果来看。第一：洋务运动创立了一批近代军用工业，缩短了中国与西方在武器装备方面的差距，对抵御外国侵略起了一定积极作用，同时也为中国国防近代化奠定了始基；第二：洋务运动创立了一批近代民用工矿企业，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促使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第三：洋务运动建立了中国的轮船公司、铁路和电报事业，开创了中国水陆交通、电讯事业的近代化；第四：洋务运动派遣留学生、设立翻译馆和各种专门化学校，系统学习西方科学知识，培养和造就了中国近代第一代科技人才；第五：洋务运动建成了中国近代第一支海军，为中国海防事业做出了贡献。以上客观事实说明历时 30 多年的洋务运动已使中国资本主义获得一定程度发展，从而为后来的戊戌变法创造了物质条件。如果没有李鸿章等人开展的洋务运动，很有可能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要推迟几十年。当然，不否认李鸿章主持洋务运动主要目的是镇

压农民起义，以维护清王朝统治，而且存在许多明显的缺陷而导致其最终不能改变近代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性质，但它的重要意义在于给后人提供了可以借鉴的历史启迪：人类文明是全球性的，中西文明的交流是不可避免的；但又是艰难曲折、充满斗争的。开放是强盛的门户，闭关是弱者失去自信的表现。只有开放才有出路，只有文化上主动进行正常的、平等的交流才有出路。

第三：李鸿章所倡导主持的洋务运动最终以中日甲午战败为标志而宣告其失败的结局，其失败原因除了它们的主持者李鸿章自身的主观因素外，也不能排斥当时中国社会环境及条件的负面影响。李鸿章出身于封建科举，受儒学的影响很深，封建传统思想的影响在他身上极为浓厚。他倡导主持的洋务运动，只限于学习和引进西方的生产技术，却不敢触及社会政治制度，他办洋务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挽救、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传统文化在他头脑中打下的深深烙印，使他一生的思想言行都不能摆脱对传统权威的依附和留恋，不可能彻底摆脱封建传统的阴影。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和束缚着李鸿章对西方文化认识的深度和广度。此外，李鸿章受中国传统的忠君思想的束缚，使他对晚清封建体制忠心耿耿，这对他所主持的洋务运动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如慈禧太后营造颐和园，挪用海军经费，以致北洋海军从19世纪80年代起就无力购买新设备，削弱了战斗力，海军官兵极为不满，但李鸿章却不敢正面抗争。李鸿章对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的深深依恋以及对封建君王和封建制度的愚忠愚孝，影响了洋务运动，成为洋务运动失败的一方面原因。此外，李鸿章是晚清

时期，尤其是 19 世纪 60 至 90 年代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化身，他的事业的失败，除个人因素外，更主要的是那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所制约的结果，中日甲午战争中，他一开始就一意求和，妥协软弱，正是他所属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中国统治阶级的时代属性使然。在主持洋务运动中，他不能不看清廷的眼色行事。所以洋务运动的失败结局从总体上说亦是封闭、落后的中国封建社会在强大的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列强争夺东方殖民地的大背景下的历史必然。

总之，对于李鸿章所倡导主持的 30 多年的洋务运动，我们不能仅从它的表面、某一方面去简单地加以评价，而应全面地、更深层次地加以认识，应注重从洋务运动本身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及结果去对它加以评述。

四、“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李鸿章的外交活动

19 世纪最后 30 年间，是世界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转化的过渡时期。在此期间，世界资本主义“开始了夺取殖民地的大高潮，分割世界领土的斗争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当时远东地区特别是中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国家激烈争夺的重要场所，在这个地区进行角逐的，除了原有的英、俄、美、法四国之外，又有两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崭露头角：一个是通过 1868 年明治维新建立了地主资产阶级联合专政，迅速走上对外侵略扩张道路的日本；一个是 70 年代初击败法国，完成日耳曼各邦统一，拥有较强的军事和经济实力的德国。新老资本主义国家采取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手段，加紧侵略中国。

面对列强的侵略，中国外交权力重心趋向双元化，逐渐形成了北京总理衙门和天津北洋大臣并存的局面。坐镇天津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成了清政府的首席外交顾问和主要外交代表，参与外交的决策和执行。在李鸿章的外交活动中，早期他推行所谓“和戎”外交，即依据所谓“理”和“势”而决定其应变方略，后期他主要主张“和议”，“以夷制

夷”的外交方针。

1. 早期“和戎”外交

（一）议结天津教案

李鸿章外交活动的正式开始是其就任直隶总督后，议结天津教案。

同治九年（1870年），在解决“天津教案”中，李鸿章与曾国藩一起，镇压了中国人民的反帝活动，维护了外国侵略者的利益，这是李鸿章搞外交活动的正式开始。

1870年6月天津望海楼天主教育婴堂因传染病有数十名幼童死亡，同时天津不断发生幼童被迷拐事件，而拐犯的供词大都牵涉到望海楼教堂。天津绅民无比义愤，聚集到望海楼教堂门前表示抗议。法国领事丰大业竟持枪逼三口通商大臣崇厚镇压群众，并开枪击中天津知县刘杰随从高升。群众忍无可忍，当场殴毙丰大业及其随从西蒙，并救出育婴堂的幼童。放火烧毁望海楼教堂、法国仁慈堂、英国布道堂等多处，打死洋人、洋教士20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事后，法国联合美、英、俄、德、比、西等国向清政府提出抗议，各国军舰麇集天津和烟台进行武力恫吓，胁迫清政府镇压绅民的反洋教斗争。天津教案发生后，李鸿章对其起因、对策等问题发表过不少议论。李鸿章在其早期的外交活动中，推行“和戎”外交，依据所谓“理”和“势”而决

定其应变方略。“理”指“是非曲直”，“势”指“力量强弱”。他明知洋人论势不论理，但在与洋人较量中却偏偏把“论理”放在首位。他在对待天津教案问题上，也是从剖析其“是非曲直”入手的。李鸿章摒弃了中国传统反洋教思想中一些愚昧偏见和盲目仇外情绪，他称赞曾国藩提出的“弹压士民，以慰各国之意”的“和议”做法，力主“不开衅端”，和平了结。他认为要坚持和议，就不能不以“拿犯”、“赔银”为归宿。正是基于上述思想和主张，天津教案在李鸿章接办不久，就基本上按照曾国藩所拟定的方案正式议结，其主要内容是：张光藻、刘杰革职，发往黑龙江效力；判处所谓“凶犯”20名死刑，25名充军流放；赔偿及抚恤银497千余两；派学厚为特使，前往法国“道歉”，并表示中国愿与法国“实心和好”。从天津教案的解决我们可以看出李鸿章的第一次外交活动就站在与人民对立的立场，不惜卖国、损害人民利益而巴结、讨好外国侵略者。

（二）与日本订立《中日修好条约》

日本是中国的近邻，1871年中日立约，揭开了近代两国关系的序幕。日本自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逐步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同时制定了征服中国、统治亚洲，争霸世界的所谓“大陆政策”，开始把侵略触角伸进神州大地。1870年9月，日本政府派政府代表，外交权大臣柳原前光一行到天津议约。10月2日，柳原拜访李鸿章，声称中日两国正在遭受西方列强欺凌，有相同命运，“实有同心协力的必要”。柳原

抛出的中日“同心协力”，使李鸿章萌发了“联日”念头。1871年7月，日本政府代表、大藏卿伊达宗诚同清政府代表李鸿章在天津开始中日立约谈判，经过多次谈判，双方于9月13日签订了《中日修好条约》和《通商章程》。这个条规和章程同此前清政府与西方列强历次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相比，是较为合理的，反映了清政府同日本修好的真诚愿望和中日双方对等的地位。条规和章程没有写入最惠国条款；规定双边享有领事裁判权；互相承认协定关税；两国商民准在对方指定的通商口岸贸易，但不得进入内地；两国商货进入对方口岸，均照对方海关税则定税。

日本签订《中日修好条约》的目的在于打开通往中国之路，他们并不因此而满足。不久，日本侵占了琉球。1879年，日本政府将琉球改为冲绳县。李鸿章认为这时正与沙俄就伊犁问题进行交涉，难以两头兼顾，竟听任日本政府攫走琉球。1885年，在日本的压力下，李鸿章与日本订立《天津会议专条》，商定将来朝鲜若有重大事件，中日两国在先行互相通知的前提下，均有权出兵。这样，就承认了日本在朝鲜的军事特权，使日本有了出兵朝鲜的借口，并最终爆发了甲午中日战争。

（三）与中秘和中英交涉

在李鸿章主持的中秘订约谈判和由马嘉理案引起的中英交涉中，充分体现了他依据所谓“理”和“势”而决定其应变方略的思想。

秘鲁是虏掠、虐待华工的主要国家之一。

早在 60 年代，李鸿章就开始关心海外华侨，并惩办过拐骗华工出洋的人贩子。1872 年当他得知秘鲁轮船“玛耶西”号拐运、虐待华工途经日本被扣的消息后，立即表示秘鲁为“无约之国”，胆敢拐骗、虐待华工，“不胜发指”，建议清廷派员赴日会审，“彻底根究，以儆效尤而保民命”。1873 年 10 月秘鲁代表葛尔西耶抵津之前，李鸿章反复筹思，拟定了谈判方针。他向总理衙门表示，要“恪承指示，内外一意坚拒”，“据理斥驳”，决不“稍涉游移”。10 月 24 日李鸿章开始与葛尔西耶会谈。谈判中，李鸿章顶住各种压力，坚决捍卫华工利益，双方争执很长时间，终于在 1874 年 6 月 26 日签订了保护华工的《中秘查办华工专条》和《中秘友好通商条约》。查办华工专条规定：中国派员前往秘鲁查办华工状况；华工在秘鲁享受寄寓该国外侨民一切利益；华工受雇主虐待，可向地方官员及高等法院控告；秘鲁政府负有保护华工和督促雇主履行同华工签订的合同的责任，合同期满应出资遣送华工回国。通商条约规定：中秘两国互派使节；两国居民在对方国内享有同等利益和权利，两国人民可以自由往来居住。1875 年 8 月 7 日，中秘条约在天津正式互换，历时约两年的中秘订约谈判和互换，表明了李鸿章坚持原则，据理力争，为防止西方殖民强盗掳掠、虐待华工做出了力所能及的努力。

就在中秘换约前半年，因马嘉理案而引发了持续一年的中英交涉。如果说在中秘订约谈判和换约中，李鸿章是“执意抗争”的，那么在中英交涉中，李鸿章就是“委曲求全”了。

从19世纪60年代起，英国几次派“探险队”从缅甸进入我国云南，进行侵略活动。1875年，英国又派一支大型武装“远征队”侵入云南。英国驻华使馆特地派翻译官马嘉理去云南带路。当远征队进入云南省腾越厅的景颇人聚居处时，与当地入冲突，马嘉理被景颇人杀死。这就是马嘉理案。英国据此向清政府进行要挟，以下旗绝交相威吓。清政府得知马嘉理被杀后，十分诧异，急忙指令云贵总督岑毓英迅速查办，随后又陆续派湖广总督李瀚章和前总理衙门大臣薛焕前往查办。对于马嘉理案件的处理，李鸿章始终主张“委曲求全”，和平了结，避免战争。他这种主张仍不外乎基于“理”和“势”的考虑。1876年9月23日，李鸿章与英国签订了著名的《烟台条约》。条约规定：中国偿银20万两给英国，主要内容是：英国得派员至云南调查，准备商订云南和缅甸之间的边界及通商章程；英人可经甘肃、青海、四川等地进入西藏，转赴印度，也可由印度进入西藏；开放宜昌、芜湖、温州、北海为通商口岸；英国可派员“观审”中国各地涉及英人生命财产的案件，租界免收洋货厘金；洋货运入内地，不论中外商人都只纳子口税一次，全免各项内地税。这些规定扩大了英国在华的通商特权，进一步破坏了中国的司法权，并为英国向中国云南、西藏扩张侵略势力提供了有利条件。英国没有动用武力，就取得了继《南京条约》、《天津条约》之后的又一批特权。李鸿章抱着“其曲在我”的态度，基本上满足了英国提出的无理要求。

（四）与巴西订约《和好通商条约》

1881年，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巴西订立了基本平等的

《和好通商条约》。

（五）主张“海防”

19 世纪 60 年代，中亚浩罕国的阿古柏入侵新疆，成立“哲德沙尔”国。俄、英先后拉拢阿古柏，乘机入侵新疆。在此前后，美、日先后侵犯台湾，造成东南沿海的一时紧张。面对这种边疆危机局面，清政府内部展开“塞防”与“边防”的辩论，李鸿章认为海防重要，他主张从新疆撤兵，集中力量保护东南沿海。李鸿章的洋务企业和军事力量，都在东南。因此，他的这个主张，实际上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势力。左宗棠反对李鸿章的主张，他认为，海防重要，但塞防也很重要。若失新疆，则沙俄可得寸进尺，进入内蒙，然后长驱直入，威逼京师，因此，必须出兵新疆。不久，左宗棠奉命率师西征，平定了阿古柏匪帮。

（六）中法签订《中法新约》

1883 年，法国侵略越南，旨在以越南为跳板，侵略中国。李鸿章担心事态扩大，于 1884 年 5 月，在天津与法国代表签订了《中法简明条款》，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此后，法国毫无收敛。1884 年 6 月，法军进犯越南谅山，七月法舰驶进福建马尾军港，八月法舰又犯基隆。在这一触即发的战争形势下，清政府中展开辩论。辩论中，李鸿章扮演了畏敌投降的角色。他强调中国兵力虚弱，武器落后，不可开战，纵然一时胜利，也会导致全盘失败。因此，要保持“和好大局”，千万不要惹恼了强大的法国。左宗棠、张之洞等人主张开战，并指责李鸿章畏敌保位，要求清政府换一个有能力的人来统筹全局。清政府最后同意宣战，但同时让李鸿章设法

与法国周旋，并乞求英国调停。就在这时，法国突然袭击马尾军港。福建船政大臣何如璋和会办海疆大臣张佩纶，因是李鸿章亲信而受其影响颇深，同样寄希望于和谈，毫无战争准备，使得马尾水师顷刻间全军覆没。福建前线军事败北的消息传到北京以后，清政府不得不于1884年8月26日下达对法宣战的命令。清廷下诏宣战之后，李鸿章虽无法改变朝廷的决策，但他仍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谋求与法国人和谈。1884年10月初正当中法两军进行激战之际，李鸿章却暗地与法国领事林椿和粤海关税务司德璀琳密谋和议。1885年3月下旬，中国军队连续取得了谅山大捷和临洮大捷，战争主动权掌握在中国手里。这一大捷，使法国茹费理内阁因在军事上的失败而引发更大政治危机宣告倒台。这时，李鸿章感到非常高兴，决定竭力尽快促成和谈。4月1日，他致电总理衙门说：“法国茹费理总理辞职不一定是专为越南方面的事所致，但新的执政者必定会反旧的执政者所为，况且谅山已被收复，如在这时平心与法国议和，和款可无多大损害，否则兵祸又会接而起了。”当时，清政府许多大臣与李鸿章持同样看法。于是，在内外一片和议之声的促使下，清政府遂允可金登干于4月4日在巴黎签订了《中法停战条件》。主要内容为：双方遵守《中法会议简明条款》；双方停战；法国解除对台湾的封锁；双方派代表到天津或北京议订条约细目和撤兵日期。按照《中法停战条件》的规定，双方必须议定正式和约才能生效。1885年4月20日，清政府委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法国新政府全权代表巴德诺进行和谈。双方于1885年6月在天津正式签订了《中法会订越南条约》，也叫《中法

新约》。其主要内容包括：1. 越南境内听任法国“自行弭乱安抚”，中国“不派兵前赴北折，不干预法越间已定和将定之条约。从而，使越南成为了法国的保护国；2. 在中国边界之外指定两处通商，一处在必胜以上，一处在谅山以北。法国商人可在此居住，法国政府可在这里设立领事馆。这样，法国取得了在中国西南通商的特权；3. 法国货物进入广西、云南边界时，应减轻税率。这就便利了法国对华经济侵略；4. 以后中国建造广西、云南铁路，应同法国商办。这使法国夺取了在中国修筑铁路的特权。《中法新约》的签订，虽然坚持了不赔款原则，但换回的却是表面上不损于中国“威望体面”的虚文，实质上是“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但夺取了整个越南，而且打开了中国西南的门户，并首次取得了在中国修筑铁路等特权。总之，李鸿章在中法战争中的投降外交，使中国丧失了更多主权。

2. 后期“以夷制夷”外交

（一）签订《马关条约》

1894年，日本政府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挑起了蓄谋已久的对华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其目的在于吞并朝鲜、满蒙，侵略中国，称霸亚洲以至整个世界。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行动，李鸿章从一开始就持“保全和局”的态度，同时，又寄希望于英、美等西方列强的出面“调停”。正基于此，他一开始就没有做好打仗的一切准备，对前方的军事情报，他漠然置之，对一些正确建议，也一概拒绝；甚至以严厉态度，驳

回了海军提督丁汝昌的几次请战。结果，陆战一败涂地，海战他苦心经营 30 多年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最后只得签订屈辱的《马关条约》。

在甲午中日战争的最后阶段，清政府曾派总理衙门大臣、户部侍郎张荫桓和署理湖南巡抚邵友濂赴日求和。但日本借口此二人“全权不够”，拒绝谈判，指名道姓要李鸿章到日本签约。同时，继续扩大事态，以达到最后迫使清政府就范的目的。由于甲午中日战争的失利，李鸿章受到朝野一致的谴责，朝廷给他革职留任的处分，并拔去顶戴花翎，黄马褂。由于日方的坚决要求，清政府撤销对李鸿章的一切处分，授其为全权大臣，赴日谈判。1895 年 3 月 14 日，李鸿章、李经方、张孝谦、罗丰禄、马建忠、伍廷芳、徐寿朋、于式枚及美籍顾问科士达等正式随员 33 人，登上德商礼裕、公义两轮，于 19 日到达日本马关。1895 年 3 月 20 日，在日本马关的春帆楼，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外相陆奥宗光开始会谈。一开始，伊藤博文就表明了日方的蛮横态度：对日本提出的各种苛刻条件，只准李鸿章回答“允许”或“不行”。李鸿章主张中日两国“应力维亚洲大局，永结和好”，不要轻动衅端，为西方列强提供可乘之机。此时的李鸿章的思想是正确的，维护世界利益的。3 月 21 日，中日双方进行了第二次会谈，日本提出了停战条件，即中国交出大沽、天津、山海关以及铁路、军需，限 3 天内答复。对于日方提出的条件，李鸿章没有立即回答，而是与日方进行了一系列的协商，最后他致密电清政府，请求指示。3 月 24 日下午，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等日方代表进行了第三次会谈，伊藤态度强横，无理要求李鸿章无条

件同意两人之间所订的和约不须批准，就可以立即生效。李鸿章回答说：“这件事关系重大，我出京时奉有谕训，所以多次对贵大臣说必须考虑到我们力所能及，如果能行的就应允，难以实行的就必须慢慢商量。”可见，对于日方的步步紧迫，李鸿章都唯唯诺诺，没有作明确答复，这在当时情势下是难能可贵的。但这种做法并没有避免《马关条约》的签订。经过几次会谈后李鸿章以为日本有进攻京都之意，于是他认为要保住京师，维持大清统治，就只得忍辱负重，出卖民族利益。他也曾经试图争取英、俄、法等国出面干涉，压服日本，但失败了。因此，在外援无着，又无劲旅保京都的情况下，他改为除了在卖国条约上签字，别无他途了。于是李鸿章于1895年4月17日与伊藤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双方还议定5月8日在烟台交换批准书。这个条约共计11款。其主要内容是：1. 中国承认朝鲜独立自主；2. 中国将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3. 中国赔偿日本军费库白银2亿两，分8次交清；4. 中国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日本船只可以沿内河驶入以上各口岸；5. 日本臣民可以在中国各通商口岸设厂制造工业品，并可以免征一切杂税。

《马关条约》是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它的签订大大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和民族危机。条约规定了巨额战争赔款，加上后来所谓“赎回”辽东半岛的款项，总共2.3亿两，相当于清政府全年财政收入的3倍。清政府在财源枯竭的情况下，除了进一步搜刮人民外，只得向列强大肆举借附有苛刻政治条件的贷款，为列强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的控制和掠夺提

供了条件。条约允许日本在华直接投资设厂，西方列强援引“利益均沾”特权，同样享有这项权利。甲午中日战争后，列强争先恐后地到中国开设工矿企业或修筑铁路，直接掠夺中国的原料和廉价劳动力，致使中国刚刚起步的民族工商业遭受巨大的打击。新的通商口岸的开放和内河行船特权的掠夺，使得列强各国可以深入长江流域广阔地区，直接掠夺中国内地丰富的资源和倾销商品，从而加深了中国经济的半殖民地化程度。条约规定割让台湾及辽东半岛等地，不但使中国失去了大片战略要地，而且使中国数百万台湾同胞，长期处于日本殖民统治的深重灾难之中。由以上所述可见，《马关条约》对中国社会产生了空前的严重影响，是一个继《南京条约》后出卖更多国家民族利益的屈辱条约。

《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国内，在全国上下引起了强烈反响。各阶层人民悲愤交集，声讨日本侵略罪行，抨击清政府和李鸿章的卖国行径。康有为等 1300 多名举人在北京发动公车上书，要求在拒和、迁都、练兵、与日本决一死战的基础上，进行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使中国走上独立富强的道路。在清朝统治层中，内而宗室王公、都院、谏垣，外而直省督抚、前敌将领，“莫不交章谏阻”，他们要求“毁约再战”，他们追究致败之由，误国之责，把一腔愤怒几乎都洒在李鸿章身上，形成了“国人皆曰可杀，万口一词”的局势。鉴于马关条约的流弊无穷和全国的抗议浪潮，清政府对是否“毁约再战”举棋不定。而此时李鸿章仍主张按期批准互换马关条约，反对“毁约再战”。清政府指示李鸿章就割台、赔款问题电商伊藤“通融更改”，李鸿章断然拒绝，说自己作为马

关条约的签订者，不能“改议电商”，“以一口说两样话，徒为外人耻笑”。这里既有恫吓，又有推诿，而意在迫使清政府按时批准换约。光绪皇帝在别无他法的条件下，只能吞下这个苦果。5月8日，清政府代表伍廷芳与日本代表伊东美久治在烟台互换批准书。

1895年11月8日，由于俄、法、德三国的干涉，日本政府被迫退还辽东半岛，但却向中国政府索要3000万两白银做为“还辽费”。这天李鸿章与日本驻华公使林董在北京签订中日《辽南条约》，具体规定了“还辽”的各项事宜。中国以3000万两白银，赎回了辽东半岛。

经过甲午中日战争，李鸿章赖以支撑其权威的北洋海军溃灭殆尽，加上他主张议和辱国，群议指摘，帝党官僚乘机要求将他密召入都，勿复假以事权，后党要员荣禄也指责他“误国”，“甘为小人”。而此时慈禧太后由甲午战争前敬信李鸿章转为甲午后信任奕劻和荣禄。正因为这样，李鸿章入觐之后，便被留在北京，奉旨入阁办事，从而失去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宝座。

（二）签订《中俄密约》

李鸿章对于日本的所有侵略行为，总想依靠西方列强出面对日本行径加以干预，迫使日本有所收敛。在与伊藤博文等人谈判过程中，他不时搬出俄、英等国来“吓唬”日本，但没有什么作用。俄、英、美等国驻京公使在中日战争爆发期间，口头上曾向李鸿章表示要对日本加以限制，但却未采取实际行动。李鸿章始终未看清西方列强的侵略本质，甚至对列强劝诱中国早日与日本和谈这个问题不仅没有反感，反

而感激不尽。因此，《马关条约》签订后，俄、德、法三国联合干涉日本交还辽东半岛，李鸿章并未看出是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一个信号，还以为是他“以夷制夷”政策实行的成功。

李鸿章和清政府一直把眼睛盯住日本，而对沙俄不仅不加以防范，反而当作救命“恩人”来看待，把沙俄看作是最值得信赖依靠的一个朋友。1896年，沙俄皇帝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典礼。清政府先派布政使王之春去，沙俄政府嫌他地位卑微言轻，不予接待。同时点名让李鸿章“参加盛典”，这表明，在“参加盛典”的名目背后，将有一大笔政治交易。鉴于沙俄要求，光绪皇帝不得不于1896年2月10日下午旨改派李鸿章为赴俄专使，任命他为“钦差头等出使大臣”前往俄国。随后，清政府又交给李鸿章访问德、法、英、美各国以重邦交，并顺便与俄、德、英、法、美各国外交部商讨增加进口洋税以挽回利权的两项任务。当然，李鸿章此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联俄制日”。

1896年3月28日，李鸿章领随员李经方、李经述、于式枚、罗丰禄及外籍顾问俄人柯乐德、德人德璀琳、法人穆意索等人，乘法国邮船“爱纳司托西蒙”号从上海起航，开始了环游欧美王国之行。4月30日，李鸿章一行乘坐专列快车抵达彼得堡，尼古拉二世在宫中亲自接见，给予了最隆重的礼遇。沙俄的笑脸背后，隐藏着叵测的居心，他们要借李鸿章来访之机，攫取我国东北主权。5月3日，沙俄财政大臣维特、外交大臣罗拔诺夫与李鸿章进行了秘密会谈。维特大谈俄国干涉日本还辽有功。随后，又向李鸿章提出“借地修路”问题，把“借地修路”同俄国“支持中国的完整性”联

系起来，企图以俄国“支持中国的完整性”的承诺为钓饵，来诱骗清政府对“借地修路”这一侵害中国主权的要求的让步。李鸿章对这个问题毫无思想准备，但他提出“种种异议”来拒绝对此问题进行表态。5月18日，李鸿章到达莫斯科，随后参加了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应邀“入宫庆贺”，“居各国专使首班”，并被授予“宝星”头等都是钻石密嵌。在沙皇的贿赂下，李鸿章妥协了。

1896年6月3日，李鸿章与罗拔诺夫、维特代表两国政府在《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即《中俄密约》上正式签字。《中俄密约》共6款，具体内容是：日本如果侵占俄国本部或中国、朝鲜，中俄两国应将所有海陆军及军火粮食，尽力互相救济；中俄两国不经两国协商同意，不得单独与敌人议和；战争期间，中国所有口岸均对俄国开放；中国政府允许俄国于黑龙江、吉林地方建筑铁路通往海参崴，此项铁路建筑由华俄道胜银行承办，其合同由中国驻俄公使与华俄银行商订；开战时俄国可用这条铁路运送士兵、粮食，平时也可以运送过往之兵士、粮食；本约自修建铁路的合同批准之日生效，为期15年。

《中俄密约》这个表面上针对日本而实则为沙俄在我国东北扩大势力的条约的签订，使中国的东北地区，逐渐成为沙俄的势力范围。通过这个密约，沙俄不仅夺得了中国东北的铁路路权，而且为以后俄国海、陆军开进中国其他口岸打开了方便之门。这一严重后果，李鸿章并未认清，反而自鸣得意，他认为“条约的谈判，很少分歧意见，俄方的动机，纯粹是要同我国结成友好关系。如果拒绝了，俄国必然怀恨在

心，而且将会对我国造成危害”。所以签订此条约是对的。《中俄密约》签订之后，中俄两方严守秘密，李鸿章回国后，对这个条约一直秘而不宣。在清政府中，只有极重要的几名枢臣知道此事。

（三）签订《胶澳租界条约》与《旅大租地条约》

《中俄密约》的签订以及旅游欧洲的行动，使李鸿章对他所推行的“以夷制夷”政策更加信奉，认为这一政策必将产生积极效果，“可保十年无事”。但仅隔 1 年后，就发生了德国强租胶州湾事件。

1896 年 12 月，德国向清政府提出长期“租借”胶州湾的要求，早就瞄准旅顺、大连的俄国认为德国这一要求，正好给他提供了借口，于是表示尽力支持德国实现在中国的侵略目标。

1897 年 11 月 1 日，两名德国传教士在山东巨野县被杀。德国政府趁机采取行动，强占胶州湾。清政府害怕德国扩大事端，一再下令山东地方当局不得有任何强硬表示，听任德国侵略者侵占这个优良军港。俄国对德这一行动表示支持。1898 年 3 月 6 日，德国在沙俄积极支持下，终于迫使清政府屈服，派李鸿章、翁同龢与之签订《胶澳租界条约》。主要包括：胶州湾租给德国，期限为 99 年；准许德国在山东修筑两条由胶州湾到济南的铁路，在铁路两旁 30 里以内，准许德国开矿；山东省内举办任何事业，如需用外国人、外国资本或外国器材，德国有优先承办权。中国的利益与主权再一次被出卖、被破坏。

与此同时，俄国政府正式向清政府提出租借旅顺、大连，

并修筑东三省铁路支线到黄海海岸的要求。1898年3月27日，李鸿章与张荫桓等奉旨与俄经过谈判之后订立了中俄《旅大租地条约》；5月7日又订立了《续订旅大租地条约》。这两个条约主要内容为：俄国租借旅顺口和大连湾及其附近湾面，租地的军政大权统归俄国所有，中国不得在租界内驻军，租期25年；租地以北，划出一段“隙地”，中国军队不经俄国同意，不得入内；允许俄国从东三省铁路干线修筑一条支线到旅顺、大连，支线所经地方的铁路利益，不得让给他国。这个条约的签订，使中华民族利益进一步被出卖了。

《胶澳租界条约》和《旅大租地条约》的签订及以后在中国大地上掀起的一股瓜分势力范围的狂潮，是李鸿章所未始料到的，同时也是对他所推行的“以夷制夷”外交政策的极大讽刺。

3. 李鸿章外交活动评析

纵观李鸿章30多年的外交政策，他始终坚持一条妥协投降的路线，他早期外交中所推行的“和戎”外交路线及后期所奉行的“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都是这条路线的具体反映。李鸿章秉承清政府中主要决策人慈禧等人的卖国旨意，几十年中同外国侵略者签订了一系列条约，这些条约中，除少数是平等的外，大部分是卖国条约。签订这些条约时，虽李鸿章是站在维护清政府统治的立场上，虽有时他也是迫于清政府压力而签订的，但正是由于他的妥协投降而使国家和民族利益越来越多地被出卖，使外国侵略者获得越来越多的特

权，使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越来越被破坏，使中国的半殖民地性质步步加深。基于这些，我们可以下结论：李鸿章的外交活动是以出卖民族利益为主流的，在外交活动中李鸿章扮演了“卖国贼”的不光彩角色。

五、“山穷水尽疑无路” ——晚年政治生涯

1. 环游欧美五国

甲午战争之后，李鸿章被解除了担任长达 25 年之久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职务。1895 年 8 月，清政府命令他留京入阁办事。此后，李鸿章的权力虽然被削弱了，但他仍是清政府倚以为同列强各国进行对外交涉的中心人物。

日本通过《马关条约》割取了辽东半岛，触犯了沙皇俄国准备要抢占的地方，沙俄便联合法国、德国出面干涉。当时，日本虽然称霸东方，但它不敢与西方三列强相抗，只好同意让出辽东半岛，不过中国必须为此付出一笔巨额赎金。1895 年 10 月 14 日，清政府以李鸿章为“归还辽旅议约全权大臣”，与日本驻北京全权大臣林权助谈判。11 月 8 日，最后议定签字，由中国付银 3000 万两“赎回”了辽东半岛。这样，在清政府眼中，沙皇俄国简直成了“救星”，被当作“恩人”来看待。为了报答沙俄这个“救星”，清政府决定派李鸿章为头等专使到俄国参加俄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同时访问

德、法、英、美四国，亲自递交国书，以联络邦交。李鸿章从内心上对这次环游欧美之举甚是高兴，但他表面上却以年老体弱、路程遥远、害怕做出“有伤于国体”的事情而致遭舆论谴责为借口，于1896年2月14日上奏表示拒绝。后经清政府再三劝说，才同意出访欧美五国。

1896年3月28日，李鸿章从上海登法国轮船离国，开始了环游欧美五国之行。

1896年4月22日抵达马赛，俄皇派此地的王爵吴克德托密斯随船迎接同入俄境。4月30日，李鸿章抵达俄国行都圣彼得堡。李鸿章抵达之后，俄国财政大臣维特即与他往返商谈两国订约之事，并议定了密约内容。5月18日，沙皇尼古拉二世在莫斯科行加冕礼，李鸿章居各国专使首班，入宫庆贺。俄国又利用这个机会同李鸿章进一步商谈订约问题。6月3日，李鸿章获得清政府批准后，同俄国外交大臣罗拔诺夫、财政大臣维特在莫斯科正式签订了《中俄密约》。李鸿章在俄国40多天，先后与俄皇尼古拉二世、俄外交大臣罗拔诺夫、户部大臣微德等人都有多次密谈。在此期间除了谈判《中俄密约》这个带有政治性条约的内容之外，所到之处都受到了盛情款待，使得这位老态龙钟的中国高级官员出尽了风头。

1896年6月11日，李鸿章离俄赴德。于13日乘火车抵达德国柏林，住在凯撒大厦。6月14日下午，李鸿章拜见德皇威廉第二于耐芝堂，代表中国皇帝向德皇酬谢其干涉还辽之事。15日，拜访了德国外长马歇尔，谈及英国放弃中国，短见自私，中国不能不与俄国友好。此后数日，李鸿章参观了

德国海陆军演习和克虏伯炮厂，李鸿章称其厂规模宏大，制造精良。此外，李鸿章还会见了已退休的前首相俾斯麦，进行了简短会谈。李鸿章在访问德国的20多天中，总想请教德国富强的秘诀，对于有关增订洋货进口税的使命并未完成。

7月3日，李鸿章离开德国，抵达荷兰京城海牙。4日受荷兰女王及皇太后盛宴款待，并参观了海滨排水工程，颇为惊叹。9日，抵达比利时，入宫见比利时王后，10日到活泼省，参观阅兵。由于荷兰和比利时均为小国，对中国利害关系不大，所以李鸿章未加以重视。

7月13日，李鸿章一行离开比利时到达法国首都巴黎，19日，拜见法国总统，递交国书，并代表中国皇帝感谢其代还辽东半岛之功。以后数日，参观了法国植物园、丝织厂、博物馆、法国银行和金库。这期间与法国农业部长会谈，设计在中国设立农业学校，对法国银行和金库参观时，这个当时黄金储备量居世界首位的、创立于拿破仑时代的大型银行，给李鸿章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对银行总办说，中国将来兴办实业，拟向法国大举借债。

1896年8月2日，李鸿章一行离开巴黎抵达英国。4日，会晤英国首相沙里斯堡，5日，拜见维多利亚女皇，并献国书，礼仪极为隆重，并阅英国海军大会操。14日，偕同驻英大使龚照璠，赴英外交部交涉改定税制，以增加中国关税，最终没有成果。23日，在英商欢迎宴会上演说，声称将使中国每一个角落都有铁路。

1896年8月27日，李鸿章一行由英国乘轮船抵达美国纽约。31日，拜见美国总统克里夫兰，并向美国国务院递交

中国海关加税节略，美国政府以“各国若见，美国无不从”的巧滑言辞婉言谢绝。至此，李鸿章在欧洲的活动前后达三四个月，除了签订《中俄密约》外，其他有关增税任务都未完成。

1898年9月4日，李鸿章一行离开美国赴加拿大，9月14日，从加拿大温哥华登美轮返国，路经日本横滨，日本政府在岸上设行馆，准备欢迎。李鸿章因马关议约之恨，竟宿舟中，不肯登岸。10月3日，回到天津。17日入京，光绪皇帝召见，被任命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

李鸿章此次出访欧美，除了外交方面失利外，在思想方面却颇有所获，在出访的前后半年多中，他亲自接触了西方文明，开扩了眼界，从过去的“耳食”经过亲自考察而有了实感，并进而与中国国情进行了比较研究，得出欧美“上下一心”，中国“政杂言庞”的结论。他所订的《中俄密约》，是其联俄制日的结果。事实证明，这个密约非但未能制日，反而为俄国独占中国东北开通了方便之门。两年后，俄国又同清政府签订了一个《旅大租地条约》，通过这个条约，俄国不仅霸占了旅大，而且还获得了修筑“南满铁路”的权力。这样，清政府花了3000万两银子赎回来的辽东半岛，很快又落入了沙皇俄国控制之下。这就是腐败的清政府为了答谢沙俄这个“救星”所付出的代价。也是李鸿章等欲结强邻以为外援和“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所带来的恶果。

2. 同情、支持康梁变法

甲午战争后，在清政府结强邻以为外援的同时，国内朝野人士由于受到战败的刺激，一时要求变法的呼声高涨。此种呼声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要求加快加大洋务的进程。因为在李鸿章看来，这次中国战败，主要是由于洋务事业受到极端守旧势力的阻挠而未能放手地进行所造成的。他希望通过这次战争的失败，能使“中国侥幸得从长夜之迷梦中觉醒”“促成中国发奋图强”。所以在签订《马关条约》回国后，他便极力劝说光绪皇帝，变法自强以战胜敌人。二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思想家要求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就在李鸿章呼吁“变法自强”之际，在神州大地上奋然兴起了资产阶级维新运动。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多次上书光绪皇帝，痛陈变法的迫切性。无论康有为提出的“再立堂构”，还是梁启超主张的“变官制”都是要求进行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以上两种变法呼声，虽有重大差别，前者是代表封建营垒中洋务派官僚的主张，后者是代表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但两者主要的冲击对象都是封建营垒中的极端守旧势力，这使李鸿章非但未感到来自后者的严重威胁，反而认为由于维新变法思潮的高涨，对其愿望的付诸实践是有利的，因此他对康、梁首先产生的不是对立情绪，相反，在某些能够容纳的方面则给予了一定的同情和支持。此外，光绪二十二年秋，李鸿章出访欧美各国考察，

由于亲自接触了西方文明，目睹了欧美各国的富强，思想为之一变。他认为：外国的物质文明是先进的，政治制度也比中国强，他对中国进行变法的必要性，有了进一步认识，这也促使他在变法运动中，倾向于维新派。

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思想家奔走呼号以求变法维新。从 1894 年起，他们就指陈旧弊，抨击科举、呼吁变法、提倡民主、出版书刊、结社讲演，极力主张仿效西方开议院，立制度，兴民权，重民权。这些主张得到了光绪皇帝的支持，终于导致了 1898 年的戊戌变法运动。

1898 年 6 月 11 日，光绪皇帝下诏定国是，表示了实行变法的决心，开始了“百日维新”新政时期。光绪二十四年六月，维新运动达到高潮，李鸿章进行了一些活动。鉴于淮军和北洋水师的惨痛失败，他十分支持光绪帝“整军经武”的措施，并寄希望于淮军将领聂士成所率 30 营淮军旧部的整顿；由于从事了几十年洋务活动，使李鸿章对经济相当敏感，他对维新派振兴农、工、商业十分支持。他支持维新派废八股，办新式学堂的措施。“百日维新”中有一件大事。1898 年 7 月，京师大学堂成立，孙家鼐任管学大臣。李鸿章为借激进的康有为代替腐儒而取得教权，并用康有为之才及其开通的思想，培养一批能肩负洋务重任的人才，便向孙家鼐推荐康有为任京师大学堂的总教道。对于官制，他按光绪帝裁撤闲散衙门的旨意，建议詹事府并入翰林院，通政司并入内阁，太仆寺并入兵部，大理寺并入刑部，光禄、鸿胪二寺并入礼部。由于李鸿章倾向变法，因此，维新派人士康有为、梁启超等，均与他有所接触。个别维新派官员，如翰林院编修徐仁铸，还

成为李鸿章的座上客。

1898年9月，慈禧太后发动政变，镇压了戊戌变法运动。在慈禧杀害、监禁维新派时，李鸿章力保维新派大臣、礼部侍郎徐致靖，使他减刑。1899年12月19日，慈禧因康有为、梁启超在海外联合华侨倡保皇会，命李鸿章署理两广总督，以便镇压康、梁余党。李鸿章抵达广东后，在慈禧的三令五申下，不得不做些姿态，按照慈禧的懿旨，颁文“悬赏购线”，以除康、梁，但他私下里对此事却不以为然。实际上，李鸿章“悬赏购线”捕康、梁，不过是表面文章。1900年2月11日，慈禧命李鸿章将康有为、梁启超广东本籍祖坟铲平，但李鸿章拖延至4月仍未执行。后遭慈禧严厉申斥，始派人铲平。可是暗中却与康、梁仍有书信来往。当慈禧血腥屠杀维新志士时，李鸿章不怕受牵连，指出“捕新党之谬”，并暗中设法为一些新党人士开脱“罪责”。对于已经逃出北京到达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安危，李鸿章一直放心不下。李鸿章在一次宴请伊藤博文及其随员大岗育造时，还试探性地问及日本对康有为如何“处置”的问题。

以上的史实表明，维新变法运动中，李鸿章是支持、同情康有为、梁启超的。但总的来说，他是表面上观望，暗地里支持。虽然他对光绪皇帝、康有为、梁启超的观点持支持、赞同意见，但他本身依附于封建王朝，不可能公开对他们的观点加以赞许和支持，所以只能采取这种态度，但他在戊戌变法运动中所做的一些较为积极的支持变法的行为，我们应当予以肯定。

3. 镇压“义和团”、支持“东南互保”

在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狂潮的危急关头，继资产阶级维新派发动戊戌变法运动失败之后，以广大农民、手工业者为主的各阶层群众，用激烈的方式投入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这就是开始于 1898 年，形成高潮于 1900 年的中国近代史上一场规模浩大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这个运动很快波及山东、直隶等北方数省，形成一场反侵略、反瓜分的斗争高潮。义和团运动迅速发展壮大，引起外国侵略者极大恐慌，他们要求清政府派兵镇压。此时，在清政府内部，展开了对义和团“剿”与“抚”，对八国联军“和”与“战”的争论。从 1900 年 6 月 16 日起，连续四天，慈禧太后召集大臣，举行御前会议，商议对策，形成两派意见。一派意见主张对义和团进行“镇压”以免开罪洋人；另一派意见则主张“招抚”，借义和团的“法术”赶走洋人。一贯主张镇压人民起义，并靠镇压人民起义起家的李鸿章，这次也不例外，他是第一种意见的持有者，主张对义和团运动进行镇压，极力反对对洋人宣战。慈禧太后权衡利弊，决定采取第二种意见，宣布对义和团采取“招抚”政策，并在 21 日发了一个同洋人宣战的诏书。此时在广东的李鸿章对慈禧太后这一举动颇不以为然，当他接到宣战诏书以后，当即以为：“此乱命也，粤不奉诏。”随后打电报给上海的盛宣怀，并让他将此意密致刘坤一、张之洞。他在致刘、张两总督的电文中认为：如果东南各省按照“宣战”诏书所说，发动义和团抵抗外国侵略，那就会

和义和团一起同归于尽，所以必须采取权宜之计，来维持各省现有的秩序，使各国放心。在盛宣怀的策划下，由上海道台余联元，加上刘坤一、张之洞委派的官员，组成代表团在上海同以美国总领事古纳为首的各国领事进行会商。双方在6月26日签订了所谓《东南保护条款》九条，其中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各国商民教士产业均归南洋大臣刘，两湖督宪张允以切实保护”。对于刘坤一、张之洞和外国人订立的这个章程，李鸿章完全赞同，因为在条约签订之前，李鸿章就是筹议“互保”的主谋。《东南保护条款》签订后，帝国主义即可以放心地在北方用兵，而不必担心南方发生对他们不利的局势。显然，这些地方督抚的做法，在形式上同朝廷的“宣战”诏书是相抵触的，但朝廷非但不责备他们，反而对他们这种做法表示同意。7月21日，刘坤一等向朝廷报告了“订定章程”之事，朝廷在答复他们的上谕中即毫不犹豫地表示了同意。到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逃亡的朝廷在一道上谕中更明白地表示了对他们订约的肯定：“前据刘坤一、张之洞等奏，沿海沿江各口商务照常，如约保护，今仍应照议施行，以昭大信。”可见，慈禧的对外“宣战”与李鸿章支持的“东南互保”的根本目的是一样的，仅做法不同而已。

4. 签订《辛丑条约》与在民族屈辱中升天

帝国主义为了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在御前会议期间的6月17日凌晨，发动了对大沽炮台的进攻。经过6小时激战，

侵略军终于占领了大沽炮台。在大沽炮台陷落的前两天，清政府即电召李鸿章迅速赴京，目的是想让他联络各国，以缓和局势，但李鸿章迟迟未行动。1900年7月，慈禧太后见形势急转直下，八国联军步步紧逼，急调李鸿章回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为向外国妥协做准备。8月14日，八国联军攻破广渠门，北京陷落。慈禧带着光绪帝和部分大臣出逃，途中，授权李鸿章“便宜行事”，让他与帝国主义商谈投降。庆亲王奕劻和李鸿章被任命为“议和全权大臣”，收拾残局。但奕劻贪财而无能，真正与外国交涉的，又是李鸿章。

起初，英、德等国态度强硬，拒不承认李鸿章为合法代表，甚至不承认慈禧为首的清政府。俄、法等国担心德国在华势力的扩大，同时，一向以“亲俄”出名的李鸿章，又私下与沙俄代表进行交易，答应给天津一块租界，并满足沙俄在东北的侵略要求，于是沙俄同意从中协调。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底，所有侵华公使举行会议。12月24日，各国代表商定一个《议和大臣》，共十二款，交给李鸿章。李鸿章连忙电告在西安的慈禧太后。慈禧太后见各国未追究自己，喜出望外，忙致电奕劻、李鸿章，全部答应了十二条要求。

侵华 11 国在利益和权利分配上进行多次争论后，取得一致意见。1901年9月7日，强迫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在条约上签了字。这个条约计 12 款，另有附件 19 个。主要内容为：中国赔款 4 亿 5 千万两白银，分 30 年付清，加上年息 4 厘，共计 9.8 亿多两；在北京东交民巷设使馆区，外国可驻兵把守，中国人不得入内；拆毁大沽至北京的炮台，外国人可在北京至山海关一线驻军；清

政府保证中国人民以后永不反帝。《辛丑条约》是帝国主义列强强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一副沉重的枷锁，这个条约的签订，进一步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国家主权已丧失殆尽，清朝统治者已完全投入帝国主义怀抱，成为列强各国统治中国人民的驯服工具。从此以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屈辱地位完全确立了。尽管造成这种局势的根源是由于清政府的腐败，但李鸿章作为朝廷命官、一位议和全权大臣，作为这一丧权辱国条约的决策者和主要执行人之一，自然负有不可原谅的罪责。李鸿章本人也在《辛丑条约》签字后半个月的9月22日，在上《和议会同画押折》中，除了汇报交涉经过，条约内容外，隐约地表现出为签订这个条约而感到心愧的实情。

《辛丑条约》签订后，李鸿章奉命总理新成立的外交部事务，与俄国人开始了马拉松式的、又是极为艰难的谈判。俄国为了避免列强干涉，玩弄花招，要求在中俄两国政府间订立撤军条约，在中国政府与华俄道胜银行之间订立“私方”协定，将东北3省路矿及其他权利全部让给华俄道胜银行。1901年10月10日，华俄道胜银行驻北京代表向李鸿章提出一份银行协定草案，坚持以先订银行协定作为订立撤军条约的条件。李鸿章不赞同沙俄这一无理要求，他明确表示只能就矿产资源的租让权同俄国谈判。10月30日，当他前往俄国驻华使馆议事时，受到俄使多方恫吓胁迫，从此病情恶化。终于于1901年11月7日死去，终年78岁。正在返途中的慈禧获悉，立即派恭亲王溥伟前往祭奠。照大学士例，赏给陀罗经被。慈禧又下诏，对李鸿章追谥文忠，晋封一等侯爵，入祀

贤良祠。又命在李鸿章立过“功”的省份山东、江苏、浙江、福建、河南及上海、天津，建立专祠，并在北京东总布胡同原李宅设立专祠。在京师设立专祠，是清朝以来汉族大臣绝无仅有的荣耀。

从封建主义的人才标准来说，李鸿章称得上是一个忠臣之士，尤其是在他晚年，处于大清王朝大厦将倾的危难之际，几乎都是由他出面同资本主义列强周旋。尽管在这一过程中，他往往采取妥协退让的态度，对国家民族造成了无法弥补的创伤；但在他本人看来，则是“尽心报国”了。总结李鸿章一生，用他自己的话说：“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他历经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代君王，在风云变幻的政治舞台上活跃了长达半个世纪之久，是晚清最重要大臣之一。他的一生是著名的，然而又是复杂的，他的功与过难以定论，只能由后人加以评说。